

突进与和谐的增长

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

[匈] 亚诺什·科尔内

经济科学出版社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中文版前言	2
英文版前言	6
第一章 背景：匈牙利经济增长的问题	9
1.1 匈牙利第一个长期计划的准备	9
1.2 基本的两难矛盾	12
第二章 和谐增长的概念：最初的近似法	15
2.1 形成和谐要求的因素	15
2.2 内部信息	19
2.3 外部信息：国际主流	20
2.4 慎重的运用	25
第三章 和谐增长的要求	28
3.1 预先的说明	28
3.2 12条要求	31
3.3 反驳和分界	48
第四章 如何度量和谐	57
4.1 是单一指标吗？	57
4.2 “流量”和“存量”的指标	58
4.3 牺牲——延期——忽视	62
4.4 进步的前缘线	69
第五章 一种特殊类型的不和谐增长：突进	75
5.1 速度的因素	75
5.2 多种不和谐的途径	78

5.3	突进的“纯粹”类型	80
5.4	突进的原因和动机	83
5.5	和谐与增长率	84
第六章	从不和谐向和谐轨道转变中的匈牙利	90
6.1	和谐要求的满足：12条要求	90
6.2	满足和谐要求：总结	102
6.3	转变与增长率	104
6.4	转变与生活水平	109
第七章	非均衡	112
7.1	投资紧张	113
7.2	“吸纳”	115
7.3	题外话：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辩论	119
7.4	储备与适应	121
第八章	计划与市场对和谐增长的影响	125
8.1	分工	125
8.2	改革与变化的相互关系	127
	参考文献	129
	译名对照表	137

突进与和谐的增长

——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

亚诺什·科尔内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翻 译：张晓光 潘佐红

靳 平 戴国庆

李振宁 黄卫平

校 对：郑伟民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长春

译者前言

本书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教授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一部专著。全书篇幅不大，但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课题，对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富有启发意义。1985年9月科尔内教授访华时曾向经济科学出版社推荐此书，1986年11月又为本书中译本撰写了前言，借此机会我们谨向作者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书的中、英文版前言、第一、六、八章由张晓光同志译出，第二、三、四、五、七章分别由靳平、潘佐红、戴国庆、李振宁和黄卫平同志译出。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中 文 版 前 言

我的著作《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将在中国出版，这使我感到很荣幸。读者可能会问，15年前在匈牙利这样一个遥远国家所写的一本书，对现今的中国经济学家有什么意义呢？我真诚地希望此书仍能带来某些有益的启示。

这本书谈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家和计划人员的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他们想要看到尽可能快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则愿意看到一种平衡和谐的发展。这两个目标，即加速增长与和谐发展的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我们越是起劲地争取高增长率，就越是可能出现某些不平衡和比例失调，从而和谐会遭到破坏。两种倾向不会以同等机会开始。出于许多原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策制定者的自然本能偏向于赞同第一种倾向。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发达的穷国产生的。因此存在着一种赶上较富和较

发达国家的强烈要求和渴望。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舞台就象在进行赛跑，在这里，唯一的获胜标准就是总增长率。最高计划人员制定过于冒进的增长目标，但是这并不与该体制的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内在动机相抵触。每一位地区内阁成员，每一位部长，每一位生产部门的领导人，每一位国有企业的经理，都想使自己的单位扩大。几个月以前，我的著作《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了。我的这本书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为什么所有经济领导人和所有企业经理的动机都具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和几乎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会碰到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一位决策者都要碰到的真正的两难矛盾，它可以表述如下：我们是否应当以推迟某些任务为代价去争取高速增长？例如，加速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生长，同时忽略运输、商业、保健、现代基础设施，等等。从后一个部门取出资源交给前一个部门，在短期内会产生特殊的生长，即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生长；但是，国家以后将要为这种片面的、偏向的和扭曲的生长形式付出重大代价，被忽视的部门将来会变成严重的瓶颈。如果公路网、铁路、航空运输、电信——特别是电话服务——、中高等教育、科研、保健没有与工农业生产并行发展，那么它将来肯定会阻碍整个生产过程。忽视发展城市住房将导致城市人口生活的紧张状态，而且以后会妨碍劳动力流动，降低劳动积

极性。高等教育和科研的相对缓慢的发展可能阻碍技术进步，而且会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当然，在本国环境下仔细研究这组问题，是中国决策者及其经济顾问们的责任。局外的观察者很容易作出错误和肤浅的判断。因此，我并不想提出具体建议，但是，我要中肯地提出一些意见。在仔细地阅读了有关中国的报告和分析之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你们国家并没有能避免我在本书中称为“突进”的病症的影响。让我们回想一下“大跃进”时期，这是“突进”型强制增长的典型例子。我猜想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中国的计划甚至在今天也还没有完全免除这种危险。改革产生了使人印象深刻的结果，但是，成功容易产生过度的抱负，过大的希望，以及过分冒进的指标。我确信，极度谨慎小心是必要的。宁可要百分点少的较低增长率，也许它低于短期可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但是，让我们以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它，在所有部门，所有地区的宽广的战线上向前推进。

“和谐”一词出现在这本小书的题目之中。我相信，这个概念与中国的传统和哲学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十分注意平衡、对称和完美的比例。我真诚希望，本书能够得到我的那些关注平衡与和谐比例，并担心偏向与扭曲增长形式危险后果的中国同事的很好理解。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本书译者和编者辛勤工作的感谢，我还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把这本书送到中国读者的手中。

言 前 献 亚诺什·科尔内

1986. 11.

英文版前言

我非常感谢“德弗里斯教授基金会”的荣幸邀请，这使我有机会详细阐述我对和谐增长问题的看法。

荷兰是一个讨论计划与增长问题的令人激奋的地方。荷兰经济学家在发展计划理论以及创立计量经济的计划方法方面起着划时代的作用。虽然我未能在荷兰做过研究工作，但是，如果我声明，根据对J·廷伯根著作的研究，我和我的几名匈牙利同事认为自己是J·廷伯根的追随者，这不应算是失敬。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主人人们的关心，是他们使得我在荷兰逗留的日子如此令人难忘。

我的论文是由1971年4月在鹿特丹所作的几次演讲组成的，尽管作了一些补充。它带有口头表述通常所允许的非正规性和松散性。我并不认为它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性著作，它不过是把一些思想连接起来，不过是对现存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反思。本文不要求囊括增长的每

一个重要问题，它只局限于少数问题，并且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前后关系。即使对于这些问题也只是从经济观点进行考察，更加深入的政治和社会学分析将留待以后的著作来完成。

我愿在此感谢G·哈伊杜先生和H·布莉斯夫人。他们协助我校订了这些演讲的英文稿。

在鹿特丹和布达佩斯的交谈曾作出许诺：这项研究可能导致富有成果的讨论，虽然是采取目前这种朴实无华的形式。我一定要进一步努力研究，以便取得更加成熟的理论结果。

布达佩斯——鹿特丹，1971年

J·科尔内

第一章 背景：匈牙利经济增长的问题

1.1 匈牙利第一个长期计划的准备

我要谈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我在研究匈牙利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

近25年来，匈牙利制定了6个中期（通常是3年或5年）计划；第六个计划现在还在执行。与此同时，国家第一个长期的、15年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匈牙利的计划人员在长期计划方面没有令人满意的实践经验，因此这种大胆的尝试完全有理由被视为是在我们条件下的一个首创。

许多匈牙利经济学家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这项工作。已经组织了9个委员会和若干分委员会，其中有数百名委员。从事理论和从事实践工作的人：教授和企业经理，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和计划局，以及各部的计划专家都参加了。我有幸成为长期计划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并应邀对一般经济问题发表意见。

已经写了大量的材料。其中有些已在刊物上发表，有些则以复制件的形式作为报告提交给那些参与和作出政治决策的人。所有这些数量众多的材料都可作为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而且这是在双重意义上的。*一方面，我明显地从这些文件中吸取了许多观点。另一方面，有关长期计划的材料反映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的讨论情况：他们的有分歧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的观点。倾听他们的讨论对于发展我自己的观点具有激励作用。**

由此可见，我不能自称在每一方面都是独创的。如果我能使人们对于目前在布达佩斯那些制定长期计划的

* 列举我看过的所有著作的作者是不可能的。我主要强调那些我从他们那里借用观点或资料特别多的作者。

E·埃赫尔利奇、F·亚诺希和J蒂马尔（国家计划局和经济计划研究所）；R·霍奇、J·科瓦奇和J·里姆莱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应当感谢国家计划局的某些领导人，副主席J·德雷琴，I·海坦尼；以及长期计划处处长G·道尔瓦什，是他们在亲自会见时提请我注意许多重要的相互关系。

我在计划局的一次讨论会上谈过本文的一些主要观点，在那里进行的讨论对澄清我的思想很有帮助。

我的几位同事阅读和评论过本文的第一稿。除了已经提及的那些人——他们都帮助我修改过这个文稿——以外，特别是M·欧古斯丁诺维奇（国家计划局）；T·鲍乌尔，G·楚柯尔，I·弗里斯，A·马道拉斯，B·毛托什和T·纳吉（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意见富有启发性。

** 有关匈牙利长期计划的问题和方法的一些论文：M·欧古斯丁诺维奇（3）和（4）；G·楚柯尔（12）；I·海坦尼（22），（23）和（24）。

注释中括号内的数字和字母表示所引著作的标号，这些著作的名称可在书末的参考文献中查到。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人们中间正在“流行”什么观点有一定的印象，那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即使许多思想和大量材料都是“借”来的，但从各种（可能是对立的）观点中，从成百万个数据中进行筛选必然是任意的和主观的；本文阐述的体系的体系是独特的。根据有关长期计划的文件，我力图说明和发展我的这样一些思想，它们占去了我15年时间——即从我开始对计划和经济政策进行科学研究以来。最后，我发展了一种只有我个人能对此负责的观点。我不打算对某些“匈牙利的官方观点”进行评论，——不这样做是因为在写作本文时，对15年计划的估计还没有作出任何有效的决定。*

从进一步的观点来看，研究长期计划材料证明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有启发的。它表明在何种程度上理论成果对实际计划确实是便于使用和切实可行的，在哪些方面理论似乎是空洞的，浮在半空中得不到任何支持，或者就此而言，甚至会使人误解。我的论文在某些论点上试图把长期计划和经济政策的现实问题、困难和疑问与各种经济思潮和学派的理论加以对照，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与后者进行辩论。

* 为写作本文所进行材料搜集工作结束于1971年6月。

1.2 基本的两难矛盾

如果能够对长期计划人员和参与制订计划的理论经济学家进行精神分析检测，也许会发现一种特殊的计划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他们似乎有两个彼此冲突的灵魂。

灵魂一是“和谐灵魂”。我们的这个灵魂对经济中的比例失调和不平衡感到忧虑和不安。它想要把和谐的思想变为长期计划的核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使国家有条不紊；加强经济发展的第一线，把相对落后的活动提高到突前的、先锋行为的水平。

一个人穿一件质地精良的衬衫，一条美丽的领带，一件雅致但已陈旧——虽然还看得过去——的茄克衫和一条裤子，外加一双露着脚趾的有破洞的鞋，会使人感到很不协调。“灵魂一”希望使我们服装的每一部分大体上都达到同一标准：也许我们应当穿一件质地不太精良，比较朴素的衬衫和茄克衫，而且还有一双没有破洞的鞋。

灵魂二是“增长率灵魂”。我们的这个灵魂首先热衷于快上加快的增长率。

增长率是我们时代的偶像。^{*}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在

^{*} 在这里和以下当一般性地谈到“增长率”而不加任何限定时，我们指的是某种总量的产出指数（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因此它与某种生产的指数相联系，而不是与消费的或国民财富存量的指数相联系。

东京和北京，它都是人所共知的偶像——为什么在布达佩斯它会不为人所知呢？

除了小的波动以外，近20年来的增长率是稳定的：1950—1969年平均为5.7%。1950—1959年，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是5.9%，在1960—1969年期间下降到5.5%。^{*}这本身并不是一种坏的表现，但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罗马尼亚或波兰的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率高的不仅有日本，而且近来还有西班牙或希腊。“增长率灵魂”隐含着一种竞争精神，它反对比别的国家长得慢。它要求把增长率的加速作为长期计划的主要目标。

我们已经提到了两个要求。和谐的要求与加速增长率的要求彼此有没有矛盾呢？许多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说情况刚好相反！快速增长恰恰是消除不和谐、比例失调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国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可以为推动较落后的部门的发展及其活动创造资源。

就我来说，我不能同意这种推论的思路。我确信，在这里我们确实有两个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冲突的要求。这种冲突将是本文的主题。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将要讨论下述问题：

——和谐的标准和要求。

^{*} 见中央统计局出版物（72），第68页。

——匈牙利增长的特点；我们经济中出现的和谐和比例失调。

——和谐、不和谐与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和谐道路向和谐道路转变的条件和后果。

——计划和市场在创造与保持和谐中的作用。

第二章 和谐增长的概念： 最初的近似法

在本文中，我多次使用“和谐”这个词，但没有能够给这个概念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这要求进一步的研究。在我的认识的现阶段，我只好严格限制自己提出的这个概念：我将分几步来论述我所讲的和谐的含义。

和谐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具有的特征，但不能就此断言，它在每一种增长中都是必然存在的。它是增长的各个局部过程之间的一种能动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满足了和谐的某种要求。这些要求本身将在后面第三章中讨论。首先我试图以一种显得有点比较一般化的形式来阐明和谐的概念。

2.1 形成和谐要求的因素

首先，我们来考察形成和谐要求的因素（详细考察在第三章）。我要强调四个因素。

(1) 人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确实，可能存在极大的个人差异。一个人愿意半辈子生活在赤贫之中而在最后作一次真正伟大的航行，而另一个人则愿意将其费用全花在吃喝上。但是，甚至除了这些极端的癖好外，需要的差异也会显露出来：每个人都要有地方居住，要穿衣、旅行等等。要紧的并不只是各类需要的最低临界值，这些是由生物性的需要甚至更多地是由社会性的需要决定的。它可以作为一种随机的群体现象来观察（自从戈森以来，这对经济学家来讲已不新鲜了），人们在不同社会影响的作用下，力求在与其环境，即物质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水平上，按比例地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他们达到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在同一时期都会要求较高质量的食物，更多文化设施的生活区，更舒适的交通工具。我们有人类本性以及需要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

和谐的要求首先反映在人类需要的比例规律上。

(2) 第二个形成和谐要求的因素具有技术性质，它取决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经验的规律。我认为，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工艺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正是这些工艺关系在技术上决定了互相依赖的现象；例如，汽车数量，公路网和加油站网络必须以确定的比例同步增长，因为其中的每一方面都是交通运输机动化所不可缺少的投入。

(3) 形成和谐要求的另一个因素是经济领导人和工程师在合理、有效和节约使用资源方面所作的努力。

(4) 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一点是，政治的和伦理的考虑在形成和谐要求中也起一定作用。匈牙利的计划术语通常把这个因素叫作“国家偏好。”负责控制社会的政府机构不可能对需求结构的发展无动于衷，而是会去干预它。例如，为了传播文化，就必须给出版、电影院、戏院和音乐事业以财政支持。采取一些免费或价格极为优惠的服务来促进社会资源更多地使用在为教育和培养儿童方面，这比之孤立的个人用在同一目的上的资源要大得多。

上述四个因素只有在抽象的层次上才能严格地互相区分开来。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第一类和第二类因素以一种“天然的”方式表明自身的存在，而第三和第四类因素则表示遵循规范化的要求所作的有意识的努力。然而实际上，这些因素显示出彼此是连结在一起的，是相互影响的。用统计观察的投入—产出关系已经在隐蔽的技术需要和以效率及合理化为决策目标的综合作用的情况下形成。消费者的需求型式同时受到一般心理和特殊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政府经济政策措施的影响。

从我说过的内容中，可以得出一些用来理解“和谐”概念的一般性结论。

“和谐”并不是一个离开价值判断的纯粹客观的范

畴。虽然我们可以依靠经验观察来取得其确定量（这在下面要谈到），但它必然是同规范化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把客观的“必然”同主观的“如果……那就好了”明确地和逻辑地区别开来是多么合乎需要，但当谈到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和谐或不和谐时，看来就不能解释了。

从四个因素中概括出来的另一个一般结论是，不存在永久的、在任何时候和在每个国家都有效的和谐比例。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不同，各国的具体要求会不同。另一方面，这些要求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从双重意义上来讲的。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国家沿着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进。一个刚刚摆脱落后状态的国家与另一个已经普遍达到高度富裕程度的国家，对和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此外，和谐的要求也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比如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 000美元），为了达到和谐，在1920年所要求的结构就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同。

因此，和谐是一种动态的要求，它与各个部门、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一成不变的固定比例是不相容的，而是需要根据确定的规则随时间变化的比例。

2.2 内部信息

和谐的要求是“有形的”，但却很难抓住，尽管当仔细思考要求的具体内容和确定量时，可以找到某些要点。这些要点可以分为两大类：内部（国内）的和外部（国际）的信号、信息和数据。

最重要的内部信息资源之一是价格体系。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理论文献讨论如何依靠一个理想的价格体系的信号来调整资源的分配，使之适应消费者的偏好。我必须承认，我对科学的方法论和这些关于一般均衡论文献的原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古典价格理论都极感怀疑。但是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已对此作了说明，这里我不愿纠缠于这一复杂问题。我宁愿采取一种更实际的态度，简略地叙述一下匈牙利的情况。

从相对价格的变化中，我们可能得到一种信号，表明需求（或者是消费者需求，或者是生产者需求）的和谐比例遭到了破坏。特别是价格自由变动或较少地受到调节时，可以感受到持续的均衡失调对价格造成的影响。即使没有其他迹象，我们从近来房屋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总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一事实中，也可以察觉到建筑业

* 这是我的《反均衡论》一书（42），（44）中的主题之一，该书在1971年出版。

的生产已落后于其他部门对它的需求。

比例失调可以通过存货的减少或积聚，以及买者在卖者前面“排长队”和未得到满足的订单正在积累等现象显示出来。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听取直接的反对意见获得比例失调与不和谐的信息：例如家庭主妇在商店里买不到有些东西的话就会发“牢骚”，城市居民对夏天缺水的抱怨，司机对于失修道路的愤怒等等。事实上，这些还是温和的抗议形式；更糟的是，不满可能以更加尖锐的形式——罢工或示威表达出来。

相对价格的变动，存货的变化，“牢骚”或其他抗议，上面所列举的所有这些信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是事后表现的，并且很大一部分具有消极的特点。当那些与此利益攸关的人察觉到了不和谐时，他们便传递信息。这非常重要，一项好的经济政策不能置甚至是温和的警告于不顾，免得出现更严重的摩擦。然而，值得花些时间用事前的信号来补充事后的信号，用积极的信号来补充消极的信号。这些方面的主要的原始资料来自国际经验。

2.3 外部信息：国际主流

在每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东

西，这些是不能在历史上再现的。这是很自然的，比如说，当匈牙利达到人均 1200 美元水平时，它既不会与捷克斯洛伐克达到这种水平时的状况完全一样，也不会与荷兰一样。但仍然存在着反映确定的国际性规律的部分相互关系。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图 1 中，横轴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总指标；衡量的单位是所谓“修正后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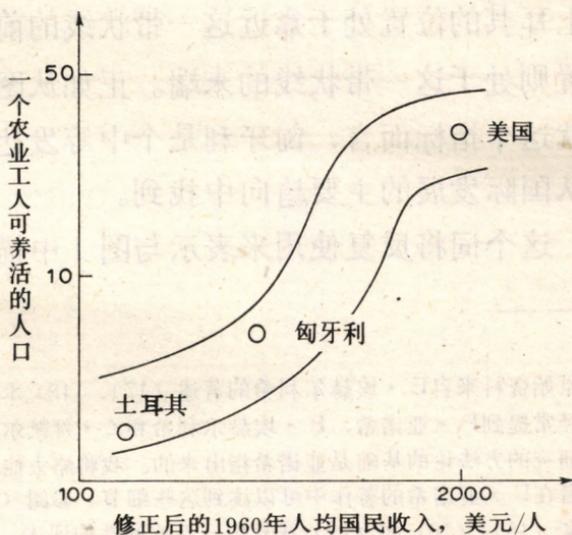


图 1 一个农业工人养活的人口作为
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民收入，人均美元”^{*}。在纵轴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商数：农业总雇佣人数除以总人口（为了贸易平衡作了修正）。该图的作者使一条回归线适应21个国家的资料情况。更精确地说，是一条带状线的两条边线分别位于回归线的上下方，并与之平行。在这条带状线内几乎可以找到每一个国家的数据资料。这可以从下述事实中观察到，即用供应食品和其他农产品表示的农业工人“养活”的居民数量，作为总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在增长。起初发展缓慢，随后加速，而后再度放慢。在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位置处于靠近这一带状线的前端，而美国的位置则处于这一带状线的末端。正如从图中所能看到的，就这个指标而言，匈牙利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这可以从国际发展的主要趋向中找到。

在下面，这个词将反复使用来表示与图1中描述相

^{*} 该数字的原始资料来自E·埃赫尔利希的著述（17）、（18）。本书的后一部分，我也将经常提到F·亚诺希，E·埃赫尔利希和Z·拜凯尔所作的国际比较。这些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是亚诺希指出来的。我将略去他们对于细节的描述，读者在F·亚诺希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这些细节。参阅（31）和E·埃利希的论文（15），（16）和（19）。我只作一点解释性的评述。在图1中，以及在我的著作的一些类似的复制图表中，横轴没有表示出象在经济统计中所使用的国民收入那样的标准概念。F·亚诺希的方法是从大量实物指标群体中（例如，电话机、汽车的存货、纸张和电力的消费等等），以及从这些类似指标的国际典型和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出经济发展水平的结论。横轴的“修正后的国民收入，人均美元”是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总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尺度。

互关系的内容：世界经济的历史主流，或者简单地
说主流。

在有些相互关系和经济指标中，可能观察不到这些主流。国际典型和时间序列的数据非常分散，以至于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规律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能够发现非常明显的国际的历史规律，并能够将其很好地运用到计划中去。

关于“主流”这个概念，必须注意一些限制条件。

(1) 主流通常指出某种局部的相互关系：单个的经济过程在动态意义上是相互有关的，或者是与总的发展水平相关的。我不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沿着相同的道路发展。但是，毫无疑问，几种重要的局部相关关系显示了动态规律的特点，它适应于许多国家，这可以从大量计算中得到证实。

(2) 主流表示一种随机规律。在图 1 中显示出的这种规律性并没有证明它同样地存在于不同国家。很显然农业的相对比重，不仅取决于发展的总水平，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自然条件，取决于其外部和内部的政治历史状况等等。

在本书中，对于图表计算中表示主流的带状线的宽度并没有严格定义上的统计要求。它也没有规定，例如用来建立表示主流区间范围的可靠程度有多大。而要建立一个一般规则是很难的，因为这总是取决于上述指标

中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和它们在计划中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一条均匀的较宽的带状线可以为计划工作创造一个有用的立足点。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需要一条窄得多的带状线，如果狭窄的带状线不能很好地适应数据的话，最好不要使用它们。

我不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确定主流的数量依据的方法论上，*对于复杂的方法论问题的说明有待于那些国际比较专家来做，我没有把自己放在他们的行列中。对于下述讨论来说，对主流的规律性的假设已经以各种方式阐述了。这已经足够充分了。

(3) 有一些主流的发展进程似乎是独立于短暂的历史时代之外，然而，另外一些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第一种类型的例子是蛋白质的消费，尽管它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但在1920年和1970年，在既定水平上是相同的。后一种类型的例子是，描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和总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互关系曲线的移动。当论述到个人消费时，这种现象本身还会重现。这里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说明更为普遍存在的事实例证：国际主流并非永远在旧河床里流动，它会为自身开出一条新河

* 我只举几个例子来补充亚诺希的方法。钱纳里(10)和他的后来者，一批联合国的研究人员(69)试图借助传统的多重回归计算方法来揭示产业结构移动的动态规律。匈牙利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组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工作(参阅E·罗曼(62)和论文(67)。L·阿德尔曼和C·T·莫里斯则借助因素分析方法进行了国际的比较(参阅(1)和(2))。

床，这是缓慢的，但在长时期中却是能够感觉到的。

(4) 存在着少数相对说来无例外地在所有国家都有效的主流。通常，我们有一种在大多数国家中起作用的趋势。有效的范围被不同的标准（分散地和综合地）限定：如相似的社会政治关系，相似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文化，相似的地理条件，等等。

2.4 慎重的运用

上述的限制条件指出，对于国际“主流”的研究应该细心地、谨慎地在计划中加以运用。

这项研究已经引进了两个概念：即“和谐”和“国际主流”。这两个概念并不一致。在最富有的国家的初期，麻醉品、大麻和LSD一类麻醉药物到处蔓延，这是一种“主流”现象，但是谁又能称之为和谐呢？或者举另一个例子：如果城市交通的主流趋于拥挤堵塞，为什么我们还要随着这股潮流走，直到我们的交通也象其他大城镇那样出现中断呢？

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有计划的和谐发展的安全、可靠的立足点。不幸的是，从2.2节中概述的国内信息，或者从2.3节中描述的国际主流中，都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许多本身不确定的事实不得不互相并列和对照着使用，同样不得不对照着计划人员和经济决策者的正确

的推理和政治道德的信念来使用。

计划人员要了解某种特别的相互关系可以从研究一种国际主流入手。从所考察的相互关系来看，匈牙利的发展是循着这股潮流展开的吗？如果不是，什么样的投资和其他措施能保证我们的发展与主流相一致呢？

但是，如果这是第一个想法的话，紧跟着应该立即有第二个想法：^{*}即一切追随这一主流究竟是否正确？没有有力的论据反对在主流之外前进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手段来抵制，抑或国际性规律的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希望出现偏离，而且这是可能的，那就可以大胆地离开国际主流，但我们决不能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就这样做。

我必须着重强调这最后半句话。我们不应该把“和谐”概念冲淡，并简单地把它等同于计划人员和政治家在经济方面的实际决策。“和谐就是一切事情按计划去做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样一种阐述是与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论述的精神相违背的。阻止毒品的扩散是对国际主流的偏离，它使增长更和谐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相对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用在居民建筑方面的钱少得多，根据住房的主流，这已经是不和谐了。我们不主张（这

^{*} 次序并不特别重要。我们也可以从国内信息和规范要求开始，然后作为第二步，将它们同国际经验作比较。最根本的是要把内部和外部信息作对比，并严肃地考虑它们的冲突。

个问题将会回过头来再谈) 每个国家在一切条件下和每个时期都必须沿着一条和谐的道路发展。也可能出现下述情况, 即不和谐增长在历史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但是限制条件应该与之截然不同: 我们决不能把不和谐叫做和谐。

第三章 和谐增长的要求

下面我要列出和谐增长的12条要求。但是在考察它的之前，我必须就这些要求的内容以及提出的方式作若干说明。

3.1 预先的说明

(1) 在本书中，我将考察实际过程，实物活动（生产、交换、消费）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精神和思想过程的和谐情况。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来说，我的主题是生产力之间的和谐。我既不分析生产关系，也不分析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正如在前言中早就指明的，本书不涉及经济增长如何与政治权力和所有制关系、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社会阶级结构等等相联系的问题。事实上，甚至经济的制度结构形式——在匈牙利经济学术语通常使用于狭义理解，即经济机制、控制

系统——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

这并不是说，似乎这些问题可以忽略不论。相反，正由于我认为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我才不愿意以一种粗浅而漫不经心的方式来研究它们。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本书的薄弱之处在于涉及的问题太多，而不在于把太多的问题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这样一来，我就能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它们作为计划问题，既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也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教育、科研必须与生产和谐发展这类要求，既可以在阿姆斯特丹或布达佩斯提出，也可以在内罗毕和新德里提出。导致本书产生的一些情况也证实这样限制论题范围是正确的：当一位匈牙利的计划工作者与荷兰经济学家会谈的时候，他很正当地把一般来说可以实施的规范性要求放在注意的中心位置。

提出要求的实际行为本身并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因为所有的要求都是依据作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道德信念而产生的。但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2) 我并不企求详尽无遗。有人很可能认为15或20条要求要比12条更合适。如果我们研究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匈牙利的那种经济类型，那么，最重要的10条或

* 存在着许多边缘的情况。直接与物质过程相联结的非物质过程在哪里终结(这是我们必须考察的)? 按上述标准我不必考察的范围界限在哪里? 在许多情况下, 答案不可避免是任意的。

15条要求的编排方式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但是，我竭力关注的是比较发达的国家（类似于匈牙利），以及更发达的、经济上先进的国家。我偏重于这样的要求，它们以两种方式构成这类国家的特征：或者它们的效果特别显著，或者在它们的实行过程中缺陷和失败特别严重。

（3）我基本上只能以定性方式刻划要求。这表明思想还不够成熟。以后的研究必须使越来越多的要求定量化。

即使在和谐区间有较大选择余地的局部情况下，我们进行定量化也很困难。因为和谐的各项要求并不很明确，一个国家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条和谐之路，而是有整整一系列和谐之路可供选择。不仅如此，在本学科的现状下，我们甚至不具备精确限定和谐系列边缘的工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选择：我们可以叙述一条或一组确实是而非和谐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划分出一组不包含确定的非和谐的道路。为了对后面一类道路有所认识，即使是仅仅以定性方式对和谐的12条要求作一考察也是有所裨益的。无论这一认识多么有限，它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匈牙利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实际经济增长过程有很长时间是沿着非和谐道路行进的。这一点本书后面将要说明。

（4）在考察要求时将会看到，和谐并不意味着静止和停顿，而是指运动和不断的变化。所有要求都是动态性质的。它们的动态特性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

例如，可以是确立某一经济过程增长率的下限。或者可以是确定两个局部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例如小汽车数量和发展公路网络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另外一种特别重要的形式：某一局部过程（如电话网路）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之间的关系。

对这些要求也必须作动态的理解，尽管由于目前的定性描述相当粗糙，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强调它们的动态性质。

3.2 12条要求

我尽力以非常简洁明了的方式叙述这些要求，仅仅对其中的某些要求详细评述。

要求 1：提高消费*。

在讨论要求 1 时，所涉及的是全国人口的平均消费量，即人均总消费量。消费的实物构成和收入的分配问题将在讨论其他要求时加以考察。

要求 1 可分解为如下几个局部要求：

(1.1) 提高消费应当均匀而有规律；既不应减缓速度，也不应长期停顿不前。

* 在叙述第一至第六条要求时，我从“人力和生活水平长期计划委员会”的材料中借用了许多思想。见“委员会报告”（68）胡萨尔、霍奇、科瓦奇和蒂马尔的文章（30）以及论文（29）。

(1.2) 提高消费对于社会的每一个重要阶层应当是“可以感觉到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来说,年增长率至少应不低于1%或2%。

(1.3) 收入分配的相对变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实施上述原则(每人至少增长1—2%),人均消费量的增长必须快于1—2%。保证在收入重新组合过程中,相对落后的社会集团的消费量也增加的人均消费增长率的下限大约是2—3%。

我们的估计已经为国际间的资料所证实。在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长期以来,人均消费水平的年增长率平均在2—4%之间。

要求2: 按比例满足消费者需要。

在要求1中讨论了消费总量的增长之后,现在我们来考虑构成问题,即消费的内部比例。

我们的出发点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互补性现象。人类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人类的天性要求相对均匀地满足各种需要。这在1.1节阐明和谐的一般概念时早已提出过,现在不过是重提而已。

消费者需要的变化可以作为以下一些因素的函数来考察:

收入。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这一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并且一般来说,也是阐述得令人满意的。关于最初的恩格尔曲线的性质和数值参数的决定已经进行了许多有

趣的分析。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物支出的相对份额减少,而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增加等现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社会环境。城市化、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劳动小时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闲暇时间的增加,在这样一些深刻的社会变动的影响下,消费者的需要会发生变化。对这些社会过程虽然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但是,关于它们对需求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要比对收入变化的影响的了解少得多。

技术进步。恩格尔曲线,即需求函数,主要是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随时间变化。在图 2 中,我们把小汽车数量作为一般发展水平(同时也就是人均收入)的函数。图的作者(E·埃赫尔利奇(17)、(18))确定了两条回归曲线;一条(虚线)对应于从1937年国际样本中截取的资料,另一条(实线)对应于1960年的资料。在此期间,曲线向上移动了。今天,每个国家都比1/4世纪以前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小汽车。

即使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也表明,人们并没有一个永远适用的偏好顺序:他们的相对需要在多种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变化着。

惰性。因素 1、2、3改变着(有时变革着)需求型式。与此相对立存在着另一个因素:惰性、习惯和保守主义。

相对价格。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第五位,并且作为解释性因素提出,并不是说我们否认它们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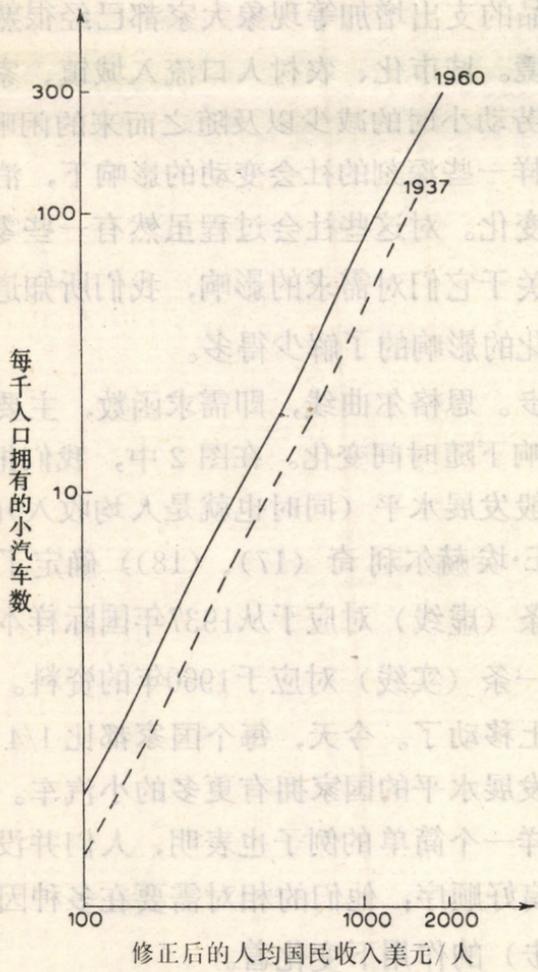


图2 小汽车数目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它们可以加速也可以减缓并抑制过时产品和老式服务以及传播新产品的过程。它们影响边际支出的变化。但是，它们毕竟影响不了消费者需求的主要比例，这是由人类

需要间的基本互补关系所决定的。衣食相对价格的较小变化或较大变化可能会使食物支出的比例在1985年占27%，或23%，而不是25%。但决不会是40%，或者10%。人们可能吃得多点，也可能吃得少点，但是他们不会用帽子来代替黄油，用衣服去代替肉。

这里我想就消费理论说两句。与此相联系，我们把对消费领域里互补性和替代性的论述简单地概括在表1中。

不容否认，消费理论已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其分析工具的精致也给人们以深刻印象。然而，在制定长期计划的过程中，计划者发现他们从消费理论获得的帮助并不大。也许消费理论家们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分析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上，过多地注意使需求函数的理论结构适应公理化的效用理论。但是，关于消费型式的长期历史主流以及国际通行的趋势，无论是经验资料还是理论概括都很缺乏。用表1中的术语来说，在消费的“策略”问题上，理论陷入了混乱，而在“战略”问题上，即对基本互补现象的研究，又茫然不知所措。*

* 1961年，数理经济学的主要刊物《计量经济学》(28)发表了该学科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霍撒克的一篇文章，对消费理论的状况作了一个概述。我们觉得有一点很特别，文章通篇对本书称之为消费“战略”(即消费的长期历史趋势)领域中的科研成果一个也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把这一方面列入有待完成的重要课题之中。(不错，文章有一段的标题叫作“长期动态过程”，但是在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称之为消费的长期动态过程完全是两码事。)

表 1 互补和替代的作用

互 补	替 代
扩大主要商品（服务）种类的比重和数量级	（1）影响主要商品（服务）种类之间的边际变动 （2）影响主要商品和服务种类内部具体、单个商品和服务在消费中的比例。
支配消费的长期趋势，消费的“主流” 计划（主要是长期计划）必须有意识地影响消费“战略”，以达到互补目的	影响消费的短期比例。“主流”中的具体状况。 消费物品和服务中的具体替代，即消费的“策略”必须受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

谈到消费型式，值得提出另一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在西方知识分子、学生和政治家中间出现的，有关现代“消费者社会”和物质需要膨胀的思想观念，关于“美国式生活方式”具有使人向往而又令人厌恶特点的观念，在我国也引起了反响。许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是否必须沿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发展的主流？我们是否应该形成某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的消费型式？

问题的最终答案（也是作者的观点）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否”。答案的实质在于：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仅仅为了“独特的道路”标新立异的话，我们不必偏离主流。因为居民的大多数无论如何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较发达的国家居民拥有的物品和服

务，并且其比例与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似。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型式的主流表达了人类需要发展的特有规律。例如，如果人造纤维和塑料在世界各地占领了服装等家庭用品和生活设施的相当地盘，那么，我们凭什么非要偏离这一发展趋势呢？

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毫无批判地、机械地追随经济发达国家。例如，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书籍、戏剧和歌剧票的价格都很昂贵，许多人很难支付得起。我们不必沿袭，而且必须不沿袭相同的道路，必须在这方面建立另外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原则的消费比例。

要求 3：有刺激力的和平等的收入的分配。

实际提出这一要求，并把它数值化总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问题。作者出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信念，希望能避免两种极端观点。

一种是要求完全的平等。某种程度的收入不均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社会有好处，也可以说是平等的。对繁重的劳动条件给予财政补助，承认和鼓励特殊的贡献，补偿由于教育和训练带来的开支和损失，这些都是必要的。

另一种极端观点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甚至支持一切收入不等的现象。人们可以争辩，补偿和刺激的观点是否能证明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比例应是1:5，或1:10，或

许是1:20。但是，肯定不会有任何一种刺激的必要使收入间的比例非得达到1:100或1:1000，虽然在一些国家里可以看到存在有这样大的收入差距。

如果整个社会集团是由于他们的国籍、肤色或性别而处于收入分配的不利地位，这就特别的有害和错误。

要求4：保险。

在这里，可以确立如下一些局部要求：

(4.1)充分就业。一般来说，必须保证每一个有能力和愿意工作的人得到就业。灵活调整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储备必须有组织地维持，必须不给处于劳动储备中的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损失。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而解除劳动力的情况下，必须保证这些暂时失业的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并对他们重新培训。

(4.2)保健。在一种有组织的制度下对全体居民保健和进行普遍的社会保险必须谨慎小心，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免费服务，或者是低价补贴服务。

(4.3)照顾老年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更高的阶段，主要的方法是普遍的养老金制度。

(4.4)公共安全。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铲除犯罪行为的社会基础，有效地保护居民，使犯罪分子不致危害人身财产安全。

在实施上述要求时，不必要——显然也不可能——保证完全的平等。一个病人或者老年人如果积蓄可观，

或者亲戚的生活水平较高并且乐于助人，显然就要比其他病人或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好。有关保险的要求需要与一国的一般经济发展相适应，对所有人一无例外地确定一个最低水平，不论他是无过失的失业，还是疾病缠身或是年老体衰。

要求 5：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

在与社会的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必须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以发挥才干的机会。应该为他开拓所有的道路：家庭出身或遗产不应当成为一种特权或无法补救的不利条件，每一个人都应当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换句话说，社会应是“开放的”。

到此为止，在以上列出的所有要求中，也许这一要求的满足才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我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在于她创造出满足这一要求的广泛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性实现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机制以及物质条件。后者也很重要。与本书的一般特点相适应，这里我更详细地讨论一下经济条件。

(5.1) 社会对于抚养子女的义务。这一方面要求社会为赡养家庭和哺育后代提供补贴（例如以家庭补助金的形式），另一方面要求社会建立照料子女的机构（幼儿园、托儿所等等）。

(5.2) 教育机会均等。基本途径是提供免费教育，

但是还应该保证能够为文化背景较差的年青人提供更多的其他机会的辅助措施。

(5.3)流动性。这牵涉到许多物质条件。从成人教育、补习课程和再培训课程，到调换住宅的可能性（如果涉及迁徙的话）。只有当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毕生束缚于最初的职业和资格水平的时候，社会才是开放的。

(5.4)妇女的社会平等。这里又有许多物质条件必须加以考虑。每一种行业，每一种工作都必须对妇女开放。必须减轻操持家务和抚养子女的负担，这一方面的任务又和要求（5.1）相联系。

(5.5)增加闲暇时间。这一需要是如此重要，也许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要求5的一部分来讨论。无论如何，增加闲暇时间肯定会促进人们发挥多方面的才能，而其中的许多才能，如果在正式工作岗位上，大多数人是不能得到施展的。

虽然我们预先对所有要求都已经有所说明，但在这里，还必须单独强调要求5的动态性质。这一性质表现出来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

要求6：教育的发展。

人们知识水平的发展，文化的丰富，以及文明和科学的繁荣，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要求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表现。这里我们仅举两点作为它的局部要求。

(6.1) 教育的迅速发展。通过对国际主流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教育发展的速度总是快于物质资料的增长速度。投资总额中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比例在增加。

要求 (6.1) 强调了普遍发展教育的任务，下面的要求 (6.2) 要讨论每一种教育活动的内部格局。

(6.2) 专业人员的生产需求和专业人员的储备之间质的和谐*。生产的扩展及其结构的转变使专业人员的需求迅速扩大。专业人员包括经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这里我们又有一种比例关系，它不能完全借助于对数量指标的加总来确定和实现。也许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经理和总工程师，而问题只在于他们是否能够胜任，是否有才能和富有经验。如果仅仅考察人员数目，工厂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也许已经满足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又有多少人是刚从农村来的，只经过匆匆培训，还是个“生手”。由于生产的量的增长面引起人力供给在质的方面落后于需求，其结果将导致严重的非和谐状况。

要求 7：在非竞争性生产中的结构比例性。

* A·基什和J·蒂马尔的论著 (35) (36) 和 (37)，F·亚诺希的论著 (32) (33) (34) 都认为，这是和谐增长的关键问题之一。

用上述著作中使用的术语来说，工作结构和工作者的资格水平结构之间应当是和谐的。

要求1至要求6突出了经济增长的“人文”方面：经济增长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对丰富他们日常消费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从现在开始，要求7至要求12，将把重点放在增长的“物质”方面，放在生产、外贸和国民财富的问题上。

我们从生产开始。我不想对目前仍有很大争论的下述问题表态：一国为了不依赖于国际贸易应该准备自给自足到什么程度，而为了利用比较利益，应该对一些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我不认为国际分工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这会牵涉到许多问题，远远超出本书论述的主题。因此，在说明要求7时，我们只限于讨论非竞争的生产领域。有相当大一部分生产（在匈牙利约为35%）是属于这一范围以内的。下述部门的产品完全（或者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划入此类：建材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特别是修理业）、食品工业的某些部门，交通运输业、供水供气、通讯、卫生、教育。我们把这一领域的活动称作非竞争性生产。

必须发展非竞争部门的生产，使之既能顺利满足彼此间的需求，也能满足国内与进口商品竞争的生产部门以及最终消费的需要。和谐比例的要求在这里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一个部门的产品哪怕是暂时成为短线，也无法用进口来替代，从而引起长期的困难。

要求8：技术、产品质量和科研的发展。

在要求7中，我们讨论了生产的数量方面，现在我们要考察它的质量方面。我们确定了三个局部要求，并且事先提请读者注意，它们彼此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部分的交叉。

第一个局部要求与投入组合和技术选择有关。原料或机器设备等投入是国产还是进口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撇开不谈。

(8.1) 生产技术的现代化。除非另有原因，必须与国际技术进步的主流和国家一般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来选择技术（即投入的组合）。

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要求。当前世界上的趋势是，原油和天然气日益成为能源生产的主角，而煤炭则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交通运输可以作为第二个例子：铁路的作用正在相对减弱。而公路运输（以及管道运输）的作用却在与日俱增。如果一国经济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同这些世界趋势的步伐保持一致，那么，它就是一种和谐的发展。

在这里，我想就新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作一评述，就象在叙述要求2时对新古典学派的消费理论所做的那样。

新古典学派的模型及其推理框架，把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一般地，在物质投入之间的替代）作为主要兴趣所在。他们对于一个追求最大利润的决策者如何根据生

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寻找最优投入组合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于是，生产理论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嵌入到效用理论的公理体系中去，嵌入到一般均衡论这一宏大而优美的知识构架中去。

我决不是否认投入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也不否认价格信号对控制生产的人确实有影响。我只是认为，这些现象的实际作用要比传统生产理论所说明的要有限和小得多。

在很短的时期内，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定的。其部分原因在于固定资本（机器和设备）的技术特性，部分原因在于控制生产者的行为惯例和自我重复倾向。主要对于中期而言，我们才有在不同的技术（投入组合）中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很显然，在很长的时期内，甚至是中期选择，事实上也深受技术进步的一般趋向的影响。这种一般趋向归根到底总是要表现出来的。

价格信号反映技术的周期性变化也许要有一段很长的时滞，或者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取决于一国具体的价格体系、税收和关税制度。对未来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测通常很不确定。无论合理的价格比例，在影响和刺激分权决策发挥有利的作用方面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完全依赖它们也是不值得的。技术变化的某一部分可以直接感受到。我们不必一直等到烧油取暖的赢利性超过烧煤取暖——这种变化甚至不必等待长期计划

和准备工作（生产或进口合适的取暖设备，解决石油或天然气的运输问题等等）开始就可以发生。有充分根据的技术预测在长期计划中起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用我们在评论消费理论时使用的术语来说，新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片面陷入了投入组合的“策略”问题，对于长期计划而言，需要一种能够用来制定技术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一种借助于经验统计分析，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世界主流、投入之间的基本互补关系以及相对投入比例的缓慢而渐进的持续变化的理论。*

(8.2) 质量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应当和产出量的增长保持同步。如果拿当代的交通运输和50年前相比较，差别就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今天的小汽车和飞机数量更多得多。当代的小汽车和飞机比以前的速度更快，乘坐更舒适，也更易于操纵。这些特点至少也和数量上的差别同样重要。电讯设备的发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质量上的转变。随着新产品和新服务项目的出现，我们今天有了录音机、电视机（甚至彩色电视机，而且都是晶体管便携式），有了立体声的发报机和收音机，长途直通自动电话，等等。

对质量发展的度量非常困难的；要想提出一个可以

* 在这方面，J·里姆莱尔关于各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经济过程的“联合运动”，关于它们的互补的动态过程的研究很值得注意。见（60）和（61）。

综合反映整个过程的指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度量的困难不能成为我们忽略这一重要方面的理由。翻阅一下关于增长理论的浩瀚文献，我们发现，到处都在用宽泛的数量指标来描述增长过程，而发展过程的质量方面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8.3) 研究和开发的促进。生产技术的开发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或者说，产品创新和工艺革新）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研究的推动。特别是科技的开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的成果也许可以从国外接受过来，但是“开发”，却是一种必须由每一个国家自己组织的非竞争活动。在这一方面，国际主流是，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费用比生产增长得更快。

要求 9：外贸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平衡发展。

我们在论述要求 7 时提及的限制因素同样适用于对外贸的讨论。我们不打算讨论国际分工的问题。由于我们不企求面面俱到，所以只强调两个局部要求：

(9.1) 国际收支平衡。不能确立非常严格的规则。借款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应该强调的只是这样一点：国际收支逆差自发扩大和过于扩大，是与

* 让我在这里也象在论述消费理论时一样，引述两位增长理论专家哈恩和马修斯的一篇概述性文章(21)。这篇概述事实上涉及了大量的文献，但是没有一处提及对增长的质量方面进行考察的科学成果，也没有把这一研究列入将来必须进行的科研课题之中。

和谐增长不相容的。如果借款的经济负担大于贷款投资的收益，如果不能顺利创造偿还到期债务必需的款项，负债就会导致不和谐。

(9.2) 出口与生产之间质的和谐。这一要求是阐述要求(8.2)后的必然结果。在那里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生产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发展应当并行不悖地和谐进行。现在我们必须补充说：出口计划也应当在质量方面与一国的一般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一般的技术文化水平相和谐。如果一个刚刚摆脱极其落后状态的国家，还不可能在质量上达到有竞争力的水平，却马上就想出口非常复杂的机器，那就会导致不和谐。

相反情况的错误同样也可以引起不和谐：当一个国家在准备与较高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出口结构过程中，存在着工作上的拖延，它不顾普遍的进步，继续出口传统部门的产品时，情况就是如此。

要求10：对可以再生的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

用相反的情况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一要求的含义。如果我们一方面在兴建新的工厂、道路、公寓、学校和生产新的机器，另一方面却不注意保养和维护旧的工厂、道路、住宅、学校和机器，那么，这就会导致不和谐。不错，总有一天旧房子要拆除、旧机器会变成一堆废铁，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仍然需要对它们精心维护。

要求11：对环境及自然的保护。

我们必须保护生产性自然资源、地下矿藏和生产用地不被滥加开发。我们必须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空气、水、森林和草地。要求11在今天早已成为每一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一再重复提起的套话。但是，即使它已成为老生常谈，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它必须作为和谐增长的一个基本要求来考虑。

要求12：永远留有储备。

随着经济的增长，生产和消费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灵活适应各种变化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如果想要避免由于适应不灵带来的震荡，我们必须在所有经济领域留有相当的储备：生产能力的储备，材料、零部件和制成品的库存，以及劳动力的储备。

3.3 反驳和分界

在2.1节至3.2节试图从正面阐明和谐增长的概念之后，现在我想对其他理论提出一些反驳意见。为了避免误解，我觉得把我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观点严格区别开来特别重要。也许它们使用的术语相似，但所包含的内容不同。

最优增长。新古典模型中使用的“最优”概念和本书中所说的“和谐”概念不是一个意思。

最优增长模型的逻辑结构如下：

存在着—组可行的增长道路的集合。虽然作者并不总是明确说明，但他们总是假定这一点：这组道路的集合受客观的技术—自然条件的制约。于是，所有技术上可行的增长道路都是这个集合中的元素。社会的希求和欲望用社会福利函数表示。存在这个函数是模型赖以建立的那些不证自明的假定之一。福利函数的存在相当于这样的命题：计划者（或政治决策人）对于技术上可行的增长道路的集合有着完整的偏好序列。

为说明这个二元问题，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二元计划问题为例。在长期计划期的期末，公共交通工具（铁路、轮船、飞机、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所运载的乘客数与小汽车的运载人数的比例是多少？（例如以人员—公里数为单位来表示）对于这个问题，传统决策理论的方案如图3所示。F是技术上可行的两种交通工具组成的集合，无差异曲线 W_1, W_2, \dots 描述社会福利函数（当然，已经针对这一决策问题作了具体说明）。最优方案 X^* 是无差异曲线和集合F边界的切点。

在作者看来，这并不是实际计划过程的一个成功的描述性模型。*传统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计划者或决策

* 见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早期著作：(39)、(40)第27章(42)、(43)第8章和12章，以及论文(41)。与我的早期研究比较起来，我试图通过下面的途径前进一步：为计划确定一些可以被计划者所接受并且可以被认为是和谐的规范性要求。

者并不具备完整的偏好序列，福利函数不存在。如果我们想建立符合实际计划和决策过程的真实模型，就必须设想另一种方案。本书引入的概念表示在图4中，例举的问题和图3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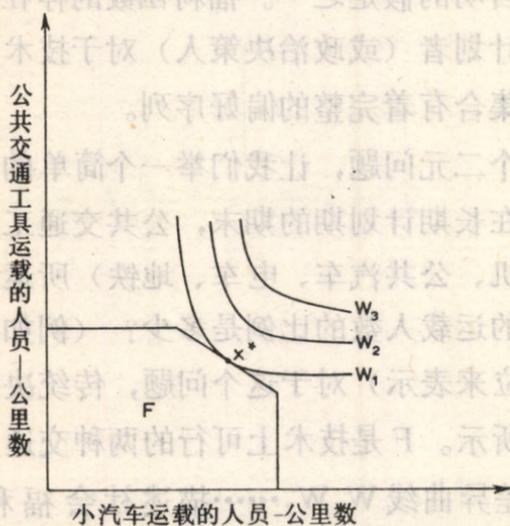


图3 最优化方案

实线围成的长方形M是“主流趋势”的相关部分。计划者已经对国家经济发展到计划期末的平均水平有了一个估计。集合M表示，根据国际经验，公共交通工具和小汽车的哪一些组合属于一般发展水平。计划者经过研究集合M，标出一个集合H：他们认为H是和谐的。或者换一种更谨慎的说法，他们相信，不属于集合H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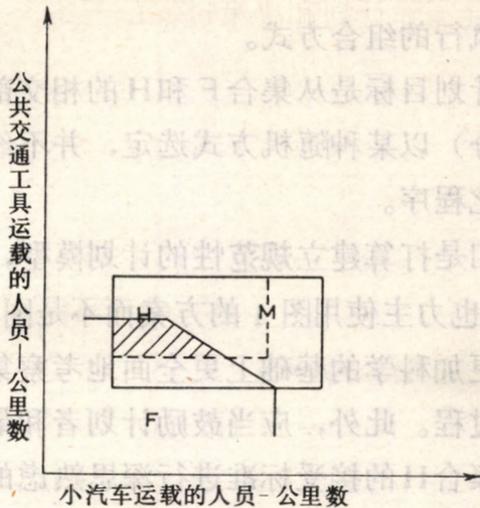


图4 根据和谐原则设立的计划方案

组合都是不和谐的，虽然他们不能肯定H的所有元素都是和谐的。

顺便提请读者注意：在画图的时候，已经假定H是M的子集；它划出了使公共交通工具起较大作用的那些组合。正是根据于此，计划者预计城市公路系统的拥挤状况将会缓解。但是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在其他计划问题方面，也许H恰巧有一部分不在M之内，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例外情况：两个集合根本就没有相交。这一切都是根据对“和谐”和“主流”之间关系的论述而来的。

但是，还是回到我们的例子上来。在计划过程中所要考察的，是技术上可行的集合F中的一部分，至少要

考虑与计划的其他部分保持和谐，努力从集合H中整理出可以实际执行的组合方式。

最后，计划目标是从集合F和H的相交部分（图中划斜线的部分）以某种随机方式选定，并不经过一种学究式的最优化程序。

即使我们是打算建立规范性的计划模型，而不是描述性模型，我也力主使用图4的方案而不是图3的方案。可以通过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更全面地考察集合M和F来改进计划过程。此外，应当鼓励计划者和最高决策者对他们限定集合H的接受标准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考虑得越全面周详越好。*但是没有必要“强迫”他们再去计算福利函数。

平衡增长。本书所说的“和谐增长”与“平衡增长”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同意“平衡增长”者的许多命题，然而我要指出在两个问题上的差别。

(1) “平衡增长”学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其创始人的思想在许多问题上各不相同。例如，他们在判断

* 分析效率要求的不同形式和思想政治标准的影响，寻找实行这些要求的界限，进行这种探讨最重要的工具是数学模型。规划模型（从数学观点看，即“最优化”模型）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 这个学派源远流长。这里举出其中几个代表人物：F·利斯特（45）、杨（66），罗森斯坦—罗丹（63）和纳支斯（53），（54）。

在斯特里顿一篇文章（64）的引言里可以找到对这一学派的简述（这篇文章就此尖锐批判了这一学派）。

若干生产部门（甚至是全部生产部门）的平行发展是否应包括在要求中时，意见是不统一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狭隘的专业化是不平衡的一个标志。

至于我本人，我不赞同所有部门平行发展的观点。在50年代的匈牙利，这种观点很流行。请读者回忆一下，我在要求7（非竞争性生产）和要求9（外贸）时曾经强调，我不打算讨论“专业化和国内生产在广泛基础上发展”这一争论很大的难题。因此，我没有把上述“平衡增长”的要求，即国内生产的全面发展列入和谐的要求之内。*

（2）平衡增长学派是按照古典的方式理解均衡这一概念的，也就是说，它要求在供给的需求之间的均衡。我自己的观点与此不同：我认为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需求是允许的，甚至是可取的。在本书的后面一章将会详细阐述这一思想。

“收费闸口理论”(Turnpike-theorem)：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冯·诺伊曼的一部经典著作(50)、(51)。冯·诺伊曼的这部著作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史上完成了一项杰出的、开创性的工作。这表现在好几个方面：它是第

* 虽然在本书中我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但为了使读者有所了解，我还是想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但不作进一步的讨论（在其他方面，我的观点和匈牙利许多经济学家和计划者是一致的）。

我认为，生产中的某种专业化、国际分工中的有机联系，可以有利于经济和谐增长的方式来表述。

一批动态数学模型之一；它对后来引起如此广泛注意的两重性定理 (duality theorem) 第一次作了清晰的表述；它把从集合论中发展起来的不动点理论第一次运用到经济学中。

问题是由这个事实引起的：在冯·诺伊曼这部著作出版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过于认真地看待了这部天才的著作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冯·诺伊曼模型通过多夫曼——萨缪尔逊——索洛合作的著作*开始复兴。

这些作者表明，如果经济体制要从既定的初始状态进入某种事先确定的最终状态，并且需要相当长的过渡时间，那么，最方便的是尽快采取所谓冯·诺伊曼之路。按照这条道路，一切部门都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生产的投入—产出结构不随时间变化。沿着这条特定的道路，增长是最快的。用这些作者的比喻来说，这就象乘小汽车作长途旅行一样。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当利用高速公路（美国人称作turnpike），必要的时候，为了达到终点，也应当转向其他较慢的次级公路。

紧跟着第一个收费闸口理论之后，又不断出现其他人的理论。**几年之内出现整整一系列类似的理论。它们

* 见 (13)。

** 例如，见拉德纳(58)，麦肯齐(47)和(48)，卡斯(9) 楚库伊(65)。在匈牙利经济学家中，主要是A·布罗迪从事对冯·诺伊曼模型的研究(见(7)、(8))。

虽然在模型的具体假定和数学论证方面彼此不同，但在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上却是一致的。

许多经济学家把冯·诺伊曼之路看作是“平衡增长”的特例。我对此有不同意见。

在本书前面一些章节里，我努力突出这一事实：即均衡增长必然伴随着结构上的转换。这可以在研究全球发展的主流时找到无数的例证：我们发现，各个生产部门的相对地位、技术（以及投入组合）、消费型式（从而需求函数）、产品的质量 and 选择、劳动力的质量特征等等在不断发生着重新组合和比例上的变化。在一种相信结构不变、所有部门的增长率相等、投入—产出组合不变性为“最佳”的理论中，发展的实质问题消失了。

当然，每一个模型都使用了简化假定。从研究的角度看，忽略一些次要的关系，或者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基本关系，对于次要关系的处理不是很精确，这都是允许的。例如，在静态的投入—产出模型中，在解决静态问题的时候，（例如制定年度计划或制定较长期间最后一年的计划）就可以采用固定的投入系数。但是，在试图描述一定时间内增长过程的动态模型中，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种动态模型的假定基本忽略了投入结构的变化（例如家庭部门投入系数的重新组合等），这就不是忽略次要关系的“简化”作法，而是把主要问题本身抛弃了。

此外，我认为，冯·诺伊曼模型（以及后来的一大批收费闸口理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确定增长率的最大化。这只有在为增长率偶象提供一个“科学”基础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增长问题并不是一个速度最大化的问题。增长的和谐与速度同等重要，不存在一个从属于另一个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实际经济政策领域认真接受从收费闸口理论得出的结论，我们就必然会只图突进和增长率的最大化，而对适应变化的灵活性、结构变化以及质量发展等和谐的要求弃置不顾。

第四章 如何度量和谐

4.1 是单一指标吗？

对于“收费闸口理论”的热烈争论引出了第四章的主题：对增长结果的度量。

描述某些国家发展的普遍做法是用一个单一指标；大多数是用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许多政治界和新闻界人士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能以“他们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之类的遁词来回避他们的做法，因为经济学界的许多学者和教授也是这样做的。

在第三章里我列举了12条要求，其中有些还有若干局部的要求。即便是逐项考虑，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不能用一个单一指标来度量。例如，让我们想一想要求4.2（保健）或者要求6.2（专业人员的生产需求和专业人员的储备之间质的和谐），或者要求8.2（质量改进）。要度量这3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能否实现，都需要一整套

指标。

的确，问题的分析会变得无比复杂。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必须容忍这种情况。任何一种旨在简化的努力——用单一指标来度量——从科学方法和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讲都意味着罪过。医学科学也被迫接受这样的复杂性，当它们表述人的健康状况时，不是仅用单一指标（例如，只用一个人的血压或体重），即使这个指标是必须的，而是（在必要情况下）考虑10个，50个甚至100个指标。为什么我们经济学家却坚持以一种不可容忍的态度来简化我们的工作呢？

4.2 “流量”和“存量”的指标

不管我们是研究政治家们的陈述，抑或是经济学家的抽象理论模型，他们通常都用流量指标（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来描述增长。事实上，对于表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存量指标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度量国民财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但这并不能证明就应该用这样一种忽视的态度来对待国民财富的定期统计观察，不管全世界都这么做。匈牙利也不利外。虽然计划经济已有20年以上的历史，但迄今对于国民财

* 在为本文搜集资料的工作结束已经很久以后，国家统计局才公布了对匈牙利国民财富的初步计算。因而我们不能更多地采用他们的计算。

富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计算。

就这方面来讲，我想提请注意的一种重要关系，这种关系我先用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个类比就是个人收入和个人财富。家庭A很长时间一直享有高收入，可能已经有好几代。但家庭B只是近来才好起来。我们假定这两家的收入现在相等。粗略一瞥能给人以一种印象：他们只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因为他们能从收入中购买同样的食品、衣物，可以买相似价值的汽车并保有它。但是，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考查两家的财富，我们就会发现有利于家庭A的巨大差别。他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家具、绘画、地毯、珠宝，也许他们还有一幢设备良好的别墅，等等。家庭A有更多的时间来积累较多的个人财富。

现在我们转向分析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我想先引进两个新概念。我们首先把国民财富（更准确地说，是可以再生的物质财富）分成两部分：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本。用这种方法可以不管作为财富的客体归谁所有（属于个人、企业、集体组织或国家），而只需记住这种区别。

消费资本就是能立即服务于消费者的一切物质财富。因而在这一范畴中既有家庭拥有的家用洗衣机，也包括洗衣业的洗涤设备。下列各项无疑都可列为消费资本。

——家庭的财富（各种匠人们的工具，他们的产品

存货以及用于生产目的的家畜之类除外。)

——住宅。

——商业企业和消费服务组织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

——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医疗、教育和其他非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房屋、设备和物质存货。

所有单位的固定和流动资产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凡与消费者无关的，无疑都应列为生产性资本。

也存在中间地带：一些单位的财富部分供应消费者，部分供应其他生产单位。属于这一类的，例如有能源生产和运输。但使用某些人为的做法，即使这些财富也能按生产性和消费性资本分开。例如，可以按消费者和生产单位所使用的产品的比例进行区分。

当然，从“生产资本——消费资本”这一对概念在本书中首次被引入以来，我们还没有掌握二者之间的准确的比例数字。（虽然我相信，在对匈牙利国民财富进行评价时，考虑这种分类并无障碍。）我曾试图仅仅提出数量的顺序，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估算。^{*}结果证明，在美国的可以再生产财富中，占一半以上的无疑是消费资本。这就充分证明在国民财富的积累中消费资本的巨大重要性。

* 我用1971年的报告做为数据来源。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作为说明而提出的两个家庭的问题——但现在是就国家范围而谈。我们比较国家A和B。前者过去长期属于发达国家，增长相对慢。后者的发展只是近来才加速；用国民收入这样的流量指标来说，它已经赶上了A国。典型的情况正如图5和图6所示，纵然后者按流量已赶上了前者，但就消费资本来讲它仍落在后面。在急剧发展的短暂时期内，它不可能积累起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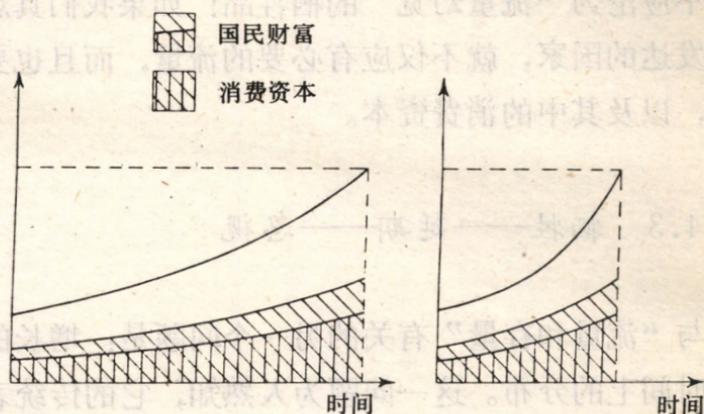


图5和图6 国民财富和消费资本的积累

国在更适宜的漫长的增长岁月中所积累的那么多的消费财富。B国将其积累主要集中用于生产资本的扩张，以保证较快的流量增长；即使在这一范围内，也是以牺牲资金密集程度更高的运输为代价，来发展资金密集程度较低的工业生产。与另一国相比，总积累中相对更小得

多的份额用于消费资本的发展（例如，住房，公用事业工程，等）。在我们的图中，转化函数线以下的斜线区域（它的积分）给出了国民财富，其中交叉线部分是消费资本。可见，虽然在终点上两国的国民收入是相等的，但积累的积分，特别是图6中的消费财富，A国要大得多。

以上所述，可以为中等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计划制定者和经济政治家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我们不应沦为“流量幻觉”的牺牲品！如果我们真想超过更发达的国家，就不仅应有必要的流量，而且也要有存量，以及其中的消费资本。

4.3 牺牲——延期——忽视

与“流量和存量”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增长的责任在时间上的分布。这一问题为人熟知，它的传统表述如下：

我们今天可以多消费，因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或者：为了未来的利益，我们今天少消费一些。储蓄被用于生产性投资。这就加速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归根结底，它将产生未来更大的消费。

因此，决策者对于消费流量以不同速度实现有一种偏好顺序。这种偏好顺序可以效用函数来表示，这一函

数概括了以不同速度实现的消费的贴现值。贴现率表示决策者的时间偏好。

自从拉姆齐*的研究发表以来,新古典的最优增长理论就建立在以上简要概述的推理之上。

但在现实中,经济政策关于现在和将来的真正两难问题有些不同,至少是以一种更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在的消费并不简单地必然与现在的投资(也就是说,未来的消费)相对抗。经济政治家们在决定中长期计划时对下列问题必须表明立场:

我们对于近期,比如说下一个五年较慢的增长率能够满意吗?或者我们希望即使在近期内无论如何也要达到非常高的增长率吗?假如我们选择了后者,有三种不同的积累方法可供我们选择:(1)牺牲,(2)延期,(3)忽视。我们依次来看一看这三种方法。

(1) **牺牲**。这一方法同以传统形式表述的两难问题的结论之一相同:现时较少的消费,代之以较多的投资。我们放弃一部分消费流量,并从储蓄中建立一笔生产性存货。例如,我们少吃点黄油,将节余出口,用在外国得到的收入买机器,安装在新工厂里。

在牺牲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放弃了一种不会积累的需求的满足;这种满足也不会被延期。我们假定在5年

* 见(59)关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参见以下的全面研究:哈恩·马修斯(21)和库普曼斯(38)。

中，每人每年不是消费25公斤肉，而只消费15公斤。5年之后我们能提供更丰富的肉类供应。也许在5年后的前几周内我们会多消费一点肉类。但最后我们将回到一种正常水平。从那天起，在5年之内，我们不会仅仅为了补偿前5年的欠账而每年消费35公斤肉。我们彻底放弃了前5年放弃的肉类配额。

(2) 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了应属于现在的存货形成(通常是消费资本形成)。但我们没有彻底放弃,行为只是被延期。建筑物消费资本的工作积累起来,我们越是将其延期,未来的负担越大。

“延期”大部分同“牺牲”有关,但在概念上两者可以毫不含糊地分开。

举一个典型例子:郊区、城市或孤立房屋同公用网络(如现代化的供排水系统)的联系。假定在这些项目上,我们只花了在经济发展现有水平上按照和谐增长所要求的一半投资。当然,这就要求那些住在尚未和供排水系统相联的房屋内的居民作出牺牲。但除此之外,创建公用事业的工作并未消失,在时间的顺序上它不会被擦掉。但是,我们毕竟是把问题硬塞给了下一代。

正如所见的,与(1)中描述的纯“牺牲”相反,在这里不会消逝的需要积累起来了。

(3) 忽视。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放弃现在的消费(流量)或现在消费资本的形成(存货形成)。这种方式

不仅意味着未来的负担，而且导致直接损失。

减少今天的黄油消费(牺牲)，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某些要求——下一代在这方面将平安无恙。*如果我们在村庄里推迟建设公用事业，我们就给下一代增添了巨大负担。但是，如果他们能制造合用的足够管道、设备、民用工程机械，以及提供劳动，就这一目的来说，公用设施可在将来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地忽视教师的培训，那就是犯罪，而且无可挽救地必然造成损害。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内没有培养足够数量的教师（特别是，如果他们是从较弱的人们中选拔；或者如果他们的培养是在低劣的水平上进行），国家的普遍文化水平将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

“延期”的概念可能主要适用于那些物质资源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公用事业建设的速度主要依赖于我们能提供多少管道、设施、机械，以及（相对容易培养的）劳动力。既然实施过程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源的量，这类工作的突然“跳跃式的”实施是可信的。与此相反，“忽视”的概念主要与“人类”的智力过程有关，——教师的培训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一领域中不存在跳跃，也不可能跳跃。我们假定教师的数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每年增加1.5%。若想决定从现在起增长率提高到5%

* 当然，这是假定我们没有把供应压到生理学上必需的营养水平之下。

是徒劳的，这样一种加速的跳跃是不可能的。教育、科研、质量改善、实际管理过程中领导人员的训练等，都是这样一些“有机增长过程”，是连续无跳跃的发展的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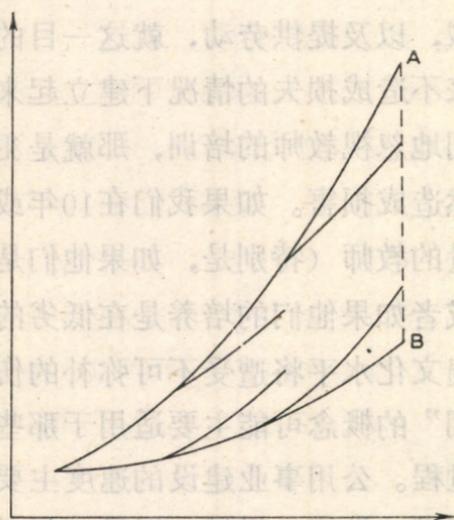


图7 “忽视”——伴有无法挽救的损失

图7表示了“忽视”的概念。在每一次决策之前我们都站在一个两条曲线的交点上。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沿着下面的一条曲线运动，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与始终选择上面一条曲线相比，我们会相隔一段不可超越的距离。即使用最大的努力，我们也不可能从B点跳到A点。

表 2 概述了对于三个概念，即三种加速增长率方法的解释。

表 2 加速的三种方法

牺 牲	延 期	忽 视
放弃现在的消费（流量） 未满足的需要没有积累起来 对于未来既不是负担，也不造成损害	放弃现在的消费资本形成（存量） 未满足的需要积累起来 对于未来是负担，但不会造成损害	放弃现在的消费和消费资本的形成 未满足的需要积累起来 对于未来既是负担，又造成损害。

在抽象层次上区分了三种概念之后，我们必须谈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些具体经济决策的结果中，牺牲、延期和忽视的要素常常相互关联地同时出现。

并不是每一次牺牲都要求一定的延期和忽视，但几乎每一次延期和忽视都要求牺牲，即使牺牲正在作出。

如果延期过分拖长，那么每一个延期早晚都会转化成忽视。也许它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忽视因素的重荷，但这一点只是当问题逐渐积累并以灾难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才为人们察觉。

城市交通是三种形式相互交叉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长期预定的任务被推迟了很长时间，这就要求城市居民都作出牺牲。最终，象许多大城市的历史所表明的那

样，交通系统发生故障。效应放大，影响了所有城市居民的生活、安全、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延期变成了忽视，正是因为问题不再是局部的，而成为一般发展的瓶颈。

虽然三种因素相互交错，它们抽象地区分在计划者的脑海里可能仍然是有用的。在每次决策之前都估量一下是值得的；这种决策的后果在多大程度上涉及牺牲？

（如果有关的人准备接受，就是可采纳的。）？在多大程度上它只是延期？（如果它不涉及到忽视，并且，由延期所释放出的资源能在别处更有效地使用，这也是可采纳的。）最后，某项决策在多大程度上相当于一种不可逆的、无法弥补的忽视，或者是一项只有付出巨大损失的代价才能挽救的决策？

问题也出现在伦理关系上：这一代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下一代的利益？但是，现实中这种严格的两代人之间的问题只影响一小部分人。参与制定1971—1985年15年计划的人们中，多数人的年龄是30—50岁；但是甚至更年轻的人也参与制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经历延期和忽视的后果。

我决不会低估在长期计划中要遵守的伦理要求，但这些问题的相当一部分在窄得多的意义上导致效率问题。让我们回到前边的问题上来：忽视城市交通不仅意味着我们狡猾地把一个沉重的负担移到了“下几代人”

的肩上，而且，消除运输障碍要比预先防止所花的代价要大得多。同样：净化被污染的河流，重新培育森林，公园和果园，也比阻止由于忽视而造成的对自然的破坏所花费的代价要大得多。

归根结底，可以这么确认：近期增长率的增加，不仅可以以现在的消费为代价(牺牲)，也可以以未来作为代价(延期、忽视)。

这一判断使我们回到本章标题所指明的主题：对增长结果的度量。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论据来反对已从其他方面受到批评的实际做法：也就是说，用某些产出增长率的全国经济指标来全面表达一种经济体制的执行情况。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问一问：在高增长率背后隐藏着什么？也许，这种高增长率至少可以部分地用这一事实得到解释：近期，它需要巨大的牺牲，而未来则要肩负着被延期和忽视的任务的重荷。

4.4 进步的前缘线

我很愿意提出另一个关于如何度量和谐要求的思想。

一国的生产能力，它在给定时间的经济潜力可用选择得很合适的存量指标来描述。它可以刻划出物质和“智力”资本的规模和构成，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国的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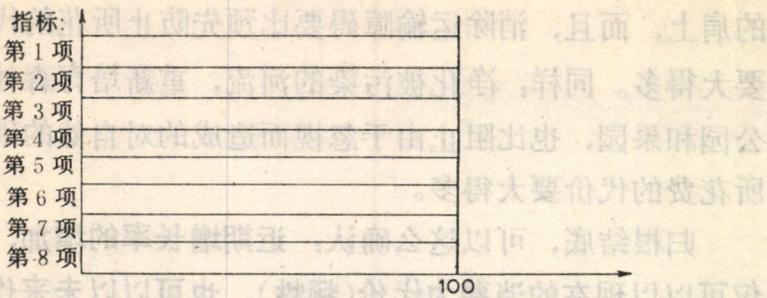


图8 完全均匀的前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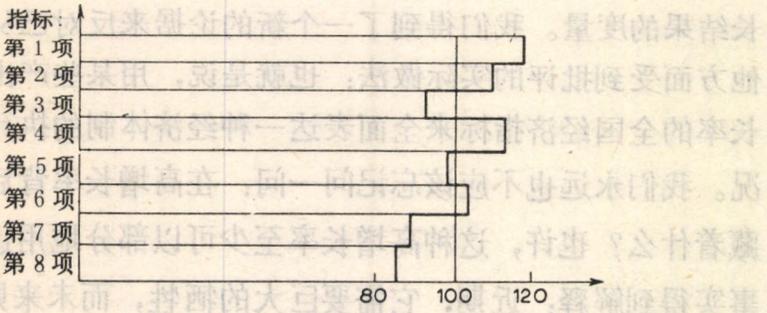


图9 相对均匀的前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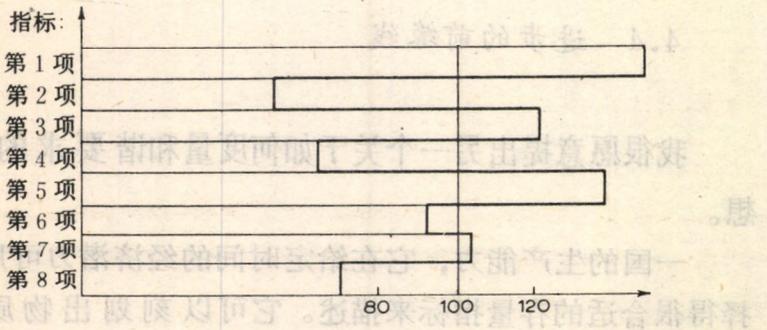


图10 不均匀的前缘线

财富、作为劳动产品的物质财富和它的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资源：人力存量。

现在我们来确定所选择的存量指标的正常标准。暂时假定我们能够陈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同的指标严格地彼此和谐，并与一国的总发展水平相和谐，在给定期间该国的各种个别指标的绝对值意味着什么。设此值为存量指标的和谐正常标准，并设此指标的正常标准值为100%。那么，我们就能把每一指标的实际值表示为和谐正常标准的一个百分数。

在图8、9、10中，每一指标都用一条水平的带状线表示出来。我把每条带状线下面用粗线画出的右边线叫做经济进步的前缘线。

图8描绘了理想情况：每一指标的值都是100%；进步的前缘线是一条垂线。在现实中这一点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100%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就不十分清楚。但是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和谐标准的值，每种实际的增长都会涉及摩擦、一系列转化中的局部跳跃和滞后。

如果进步的前缘线显示出的国家不是图8，而是图9，我们也会感到心满意足的。前缘线是相对均匀的，彼此间隔并不很宽。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是和谐的。我们把各条带状线的界限画在 $\pm 10\%$ 或 $\pm 20\%$ 的范围之内，当然是一种武断的做法，但如果允许间隔在 $\pm 50\%$

之内，显然就是错误的。

与此相反，在图10中，我们表示了一种严重不均匀的进步前缘线。这里，偏移远远超出了可称为和谐的任何界限。左边的短带是由于忽视而对一国存货所带来的结果。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是不和谐的。

图8、9、10是现三幅“快像”。但对于用“电影”表示出来的前缘线的动态研究则更重要得多。术语在这方面也有它的含义：我们不是要简单地叙述存货的类型、构成，而是要叙述进步，也就是说，描述运动的前缘线。

我们来对比一下图11和图12。两图中横轴都起着双重作用。它部分用来度量时间，比如：度量20年计划中第5年末、10年末、15年末和20年末的计划存量，另一方面，对每一年来说，垂直的虚线表示和谐的正常标准。为了简化，我们只观察4项存量指标。例如，它们可能是：工业资本的生产性存货，道路网，拥有文凭的工作人员数，以及住宅存量。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表示经验数字，它只用于说明。

图11中显示的进步可以被承认为是一种和谐的进步。也就是说，前缘线在改变自己的形状：第1项指标，接着是第2项指标，时而落后，时而超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有些甚至就是这样要求的：资源集中用于执行某一确定任务，它涉及到储蓄，以及由于大规模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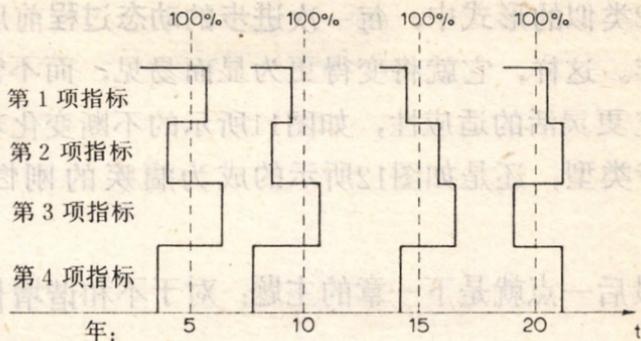


图11 和谐的进步 (运动的前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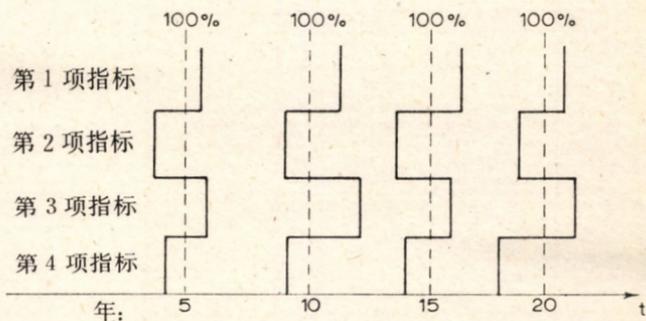


图12 不和谐的进步 (刚性的前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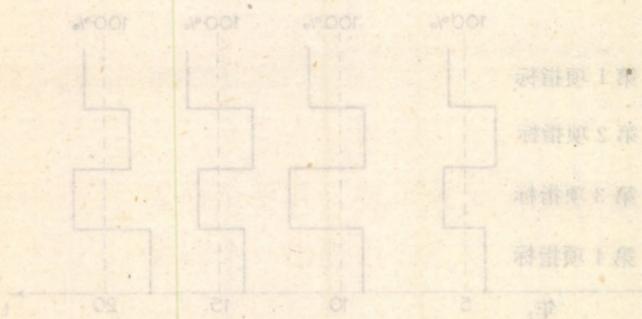
而造成的相对规模利益的节约。与此相反，图12中的进步是不和谐的。短线难于纠正，前缘线是刚性的。延期成为持久性的，并越来越转化成忽视。

把图9-12中的相似之处加以分析是明智的。如果正常标准的估计不那么确定，并且我们不完全知道100%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什么损害。主要问题在于，在与图

11—12类似的形式中，每一次进步的动态过程前后大约为20年。这样，它就将变得更为显而易见，而不管我们是研究更灵活的适应性，如图11所示的不断变化着的和谐进步类型，还是如图12所示的成为痼疾的刚性不和谐。

最后一点就是下一章的主题：对于不和谐增长的分析。

(美英前情表) 表长西管叶 11图



(对表前情表) 表长西管叶下 12图

图12中，又出现了，这种不和谐的增长，其特点是，在进步的初期，增长的速度很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的速度越来越慢，甚至出现停滞不前或倒退的情况。这种不和谐的增长，往往是由于刚性不和谐造成的，它会导致系统失去适应性，最终走向崩溃。

第五章 一种特殊类型的 和谐增长：突进

5.1 速度的因素

在研究了和谐增长的概念、要求和一些度量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转入讨论不和谐增长。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对增长速度因素讲几句。

首先，我非常谨慎地、几乎是抱着对大量的意见不一致和受到批评的担心，提出一个假设。

我认为，当一个国家已经超越了初始的、为克服落后而急速增长的时期即“起飞”时期，并且此后多少是和谐增长的时候，通常会形成某种“正常”增长率。这大约在3—4%（它可以是2%或5%，但不可能是1%或7%）。

一国的实际增长率有可能更快，甚至比“正常率”快得多。但这总是有某种特殊原因。不存在经济奇迹。我想提出使增长加速的某些现实因素*。

* 为简单起见，我将不讨论具有相反作用的“减速因素”。它们的一部分不过是加速因素的反面，如不那么有利的自然环境，外部剥削，等等。

(1) 特别有利的自然环境。有地质矿藏，适于农业的气候和土壤，海岸和港口条件，能吸引旅游者的自然风光，等等。按人均地质矿藏，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条件不变，可以确信科威特会比埃及和苏丹增长得快。当然科威特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的邻国罗马尼亚在自然条件方面比匈牙利更富有，它有海岸和所有保证增长率所必需的资源。

(2) 在国际冲突中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例如，没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就处于有利地位。我们可以用处于经济进步前列的各国，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瑞典和瑞士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

这里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反论，我们提出联邦德国和日本。尽管它们是二次大战的战败者，但正是这一点使它们的军费开支远少于战胜者。由于放弃军国主义，储蓄能够用在经济增长上。

(3) 外部资源可以有助于加速增长。这可以采取许多形式：

——剥削殖民地。

——移民。特别是在近代，高质量的专家——他们中的一些是宝贵的科技专家——移居到最发达的国家，而训练费用则是这些移民的祖国承担的。

——国外投资所赚得的利润。

——外国援助。

——在国外工作的本国人寄回的收入。(这是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的外部资源之一。)

还没有关于外部资源实际作用的完全彻底和客观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过多地受到各种政治偏见，宣传和反宣传观点的影响。

(4) 生产和管理上的高效率可以加速一个国家的发展。勤俭节约、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就业、劳动者特殊的热情和觉悟、进取心和首创精神、发明的迅速引进、深谋远虑的投资决策、精明的对外贸易，等等，所有这些都归入“效率”这个栏目中，这个清单还可以开列下去。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结合了所有效率因素。但是上面列举的许多因素在苏联、日本或美国的经济增长中确实发挥了作用。

我们把计划的积极作用列为提高效率 and 随之而来加速增长的重要手段。我们把这一点放在最后，并不是说它最不重要。

(5)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用总量指标度量的增长率可以用前一章提到的牺牲、延期和忽视作暂时的重新组合来加速。

长期计划被证明能提供比正常增长率(6%、7%，或8%)更高的增长率，如果能够确保在计划期间1—4条中提到的那些加速因素起作用，或是其中的一些因素相结合，或是如果有意识地进行对牺牲、延期和忽视作暂时

的重新组合。

5.2 多种不和谐的途径

把任何国家理想化都是错误的。“和谐的增长”是一种理想的结构，而事实上，它的纯粹形式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实现。各国经济史都表明了现实过程同纯粹和谐的偏离。

的确，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所做出的一切说明不过是对各种具体的历史增长过程作出系统的评价。这就象我们提出学校的课程表和评分标准，在此基础上就能授给学生学业证书。

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美国的发展。从物质财富上看，它是现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它的增长过程并不是和谐的，今天也不是。

美国的致富部分地可以归结为5.1节中所列举的那些独特的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的历史环境和外部资源。此外还应当加上生产的高效率（也夹杂着相当大的浪费）。最后，在这个国家我们也能看到牺牲、延期和忽视。我们想指出最明显地违反3.2节提出的12条要求的方面。这里根据那里排列的顺序只提出标题：

(1.1) 消费增长不均衡，经常出现人们消费水平的下降。

(2) 尽管在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存在严重缺陷的方面（如，城市交通拥挤，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住房问题，等等）。

(3) 极端尖锐的收入不公平。很大一批人处于不利地位，主要是黑人。

(4.1) 就象现在这样，经常有大批失业人口。

(4.2) 尽管在医疗保险和一般社会保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免费或优惠条件的医疗保障却正在消失。

(4.3) 几乎没有给老年人任何照顾（很大一段时间一点也没有）。

(4.4) 已经很坏的公共安全状况还在变坏。

(5.1) 社会对儿童培养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5.2) 教育机会不平等；相当一部分人的子女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5.4) 妇女平等所需要的多种物质条件缺乏。

(11) 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

许多经济和谐增长的基本要求得到了充分满足。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要求7：非竞争生产的按比例；要求8：迅速的技术进步、质量提高和研究成果。

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国家，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上述研究也支持这个已成为常识的真理。我们可以用不和谐增长来表明这个物质财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特征。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分析其他国家。无论从创造了二次大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和联邦德国，还是从最近加速增长的西班牙，都能找到不和谐增长的特征。也许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将能够对不和谐增长的重要类型作出划分。但是现在我还不敢作出这样的分类。我只想详细探讨其中一种简单类型；下面我将称之为强制增长或突进。

5.3 突进的“纯粹”类型

我主要是根据匈牙利1949—1953年期间的经验提出“突进”这一概念的。但是我试图多少能超出一个国家在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所特有的东西。我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解释“突进”，然后将提出定义。突进属于不和谐增长途径的一个较广泛的类型。突进的一些特征也出现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此相关的现象也能从非社会主义国家找到，主要是那些落后的前殖民地而现在已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并希望迅速发展的国家。

“突进”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增长方式（按M·韦伯的术语来解释“理想类型”）。这是一种理论构造，现实中其纯粹形式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我们只能表明一些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已经显示出与突进有关的征兆。

温度的实际测量是借助标出冰点和沸点这两个充分定义的温度来实现的。在这两个“纯粹”的点之间划分出一百个单位。我想让理论结构中“纯粹”的和谐增长和“纯粹”的突进发挥类似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实际增长过程是这两者（或这里未讨论的更多的纯粹类型）的混合体。“纯粹”类型的结构有利于描述、说明和理解混合体。

在对这个概念的引入作了说明之后，我们现在转入它的定义。我们用表格形式来给出定义。在表3中，行是根据和谐增长的12条要求及与其有关的各个子项来划分的。列表示三种跨时方式的加速：牺牲、延期和忽视。表中的空项表示突进没有违反要求，而在某项下面划叉则表示违反。叉的多少表示违反要求的严重程度。

尽管表中的每个空项和所有的叉对理解突进概念都很重要，但我还是提请读者注意某些主要特征。

突进要求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一代人作出巨大的牺牲。但不仅是他们，它也给将来增加了负担。它延迟了消费方面的投资工作，在消费资本形成上造成欠帐。因此，很可能是，实行突进的强制增长的国家比人均产业相同但较少采取突进方式的国家，其消费资本要少得多。

在突进中，质量落后于数量。

正在突进的经济中，没有足够的储备，适应性变动

表 3

突进的和不和谐特征

序号	和谐的要求	牺牲	延期	忽视
(1)	提高消费	× ×		
(2)	按比例满足消费者需要	× ×	× ×	
(3)	有刺激力的与公平的收入分配			
(4.1)	充分就业			
(4.2)	保健	×		
(4.3)	照顾老年人			
(4.4)	公共安全			
(5.1)	社会对培养儿童的贡献			
(5.2)	受教育机会均等			
(5.3)	流动性			
(5.4)	妇女的社会平等			
(5.5)	增加闲暇时间	×		
(6.1)	迅速发展教育		×	
(6.2)	生产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与专业化人员供给之间质的和谐		×	×
(7)	非竞争性生产中的结构比例性	×	×	
(8.1)	生产技术的现代化			
(8.2)	质量改进	× ×	× ×	×
(8.3)	研究和开发的促进			
(9.1)	国际收支平衡		×	
(9.2)	出口与生产之间质的和谐		×	×
(10)	对可以再生产的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	×	×	
(11)	对环境和自然的保护		×	
(12)	对储备的不断关心		× ×	

不够灵活和迅速。在一些领域中，存在着原材料、能源零配件、生产能力和劳动的短缺。短缺的状况经常导致强烈的紧张气氛。

5.4 突进的原因和动机

把突进解释为一些政治家过分雄心勃勃的结果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论点。而把突进简单地说成“非理性的”经济政策则更肤浅。

突进通常出现在贫穷落后的国家。这正是20年代的苏联和二次大战后的若干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但这种突进的增长政策也出现在若干非社会主义的亚非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不仅是权迷心窍的政治家的口号，它也是成百上千万人真诚的愿望。我们很难让一个匈牙利、波兰或印度冶金工人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因为他出生在这些国家而不是美国，所以只好比他的美国同行生活得差。在落后国家的居民中间，我们能看到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有些人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有关的收入分配是可接受的，也有些人持反对意见。但是几乎无例外，每个人都认为下述情形是不公正的，即从事同样的工作，具有同等工作质量并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只是由于一个人生在富国，另一个人生在穷国，他们之间的生活水平便出现无法逾越的鸿沟。随着相对距离的缩短，当穷国的人通过旅游者、电影和电视更多地了解到富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时代的紧张气氛也增长起来。这种紧张气氛，对落后的认识，人类的忌妒感，这些正

是突进的重要动机。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威胁感和危机感。这正是苏联高速增长初期的情形；现在的中国当然也是这种情况。当时苏联担心受到进攻，历史证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此，她努力尽可能快地发展构成国防实力基础的冶金、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

尽管本论文前面的部分已经强调过这一点，这里还想再次加以强调，我们把突进定义为不和谐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对它加以谴责。可能存在着需要非和谐（或使它至少可以理解、辩解或原谅）的历史环境。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标准来确定什么时候不和谐增长是正确的，什么时候是不正确的。

我同样不打算建议某些国家继续实行突进或开始这一过程，建议另一些国家不采取这种方式。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情况。无论什么地方，依靠本国的经济学家来做这件事是更为有利的。因而我将仅限于分析匈牙利的情况。我在下一章针对匈牙利提出的一切规范性意见和建议，都不包含一般化的含义。

5.5 和谐与增长率

在说明了突进这个概念以后，我们想回到第一章已经指出的那个难题，即和谐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这两种要求在理论上并不存在直接的逻辑矛盾。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动态计划模型，其中用一定的约束条件描述出和谐的要求，并对这些要求的目标函数求出极大值。

但是，在写这篇论文时，我所想的不是一个抽象的计划模型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而是支配日常经济政策的实际工作。从这种观点出发，以和谐为目标的经济政策能够明显地同不惜违反和谐的要求，一味追求增长率的政策区分开来。

由于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纯粹地”表现出那种或那种增长方式，我将借助思想实验来加以比较。在同一国家（或者在同等外部条件和同等的历史时期的同一出发点），如果采取“纯粹”和谐增长的方式或采取强制增长（突进）的方式，其增长率之间可能会有多大的偏差呢？

“纯粹”突进方式同“纯粹”和谐方式相比将会表明，前者的增长率比后者更高。

这种偏差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度量产量的指标。我们的指数反映的产出范围越狭窄，有利于突进的偏差就越大。因此：

排除了服务部分的会计制度（MPS，即物质产品平衡体系）比包括服务的制度（SNA，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会更多地显示出有利于突进的偏差。这很自然，因

为突进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忽略服务业，而在前一种会计制度中这一点变得模糊了*。

这个思想可以用图13和图14来表明。在图13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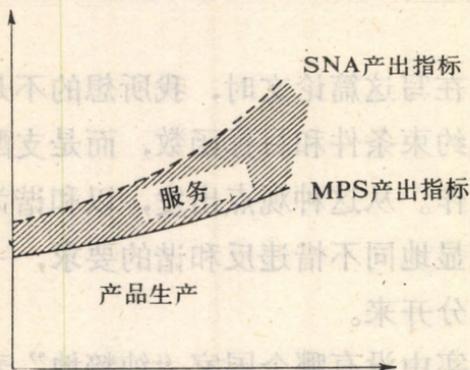


图13 用MPS和SNA指标衡量的和谐增长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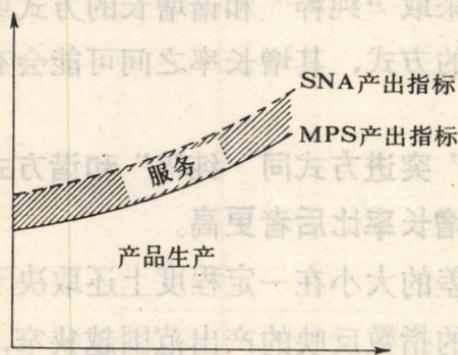


图14 用MPS和SNA指标衡量的强制增长轨迹

* 现在匈牙利的统计时常根据两种制度来表示社会生产的基本资料。同时还根据两套制度来编制长期计划。在运用SNA制度时，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度量服务的产出。

和谐增长的轨迹上，服务的份额是不断增长的；而在图14中，在突进的轨迹上，这部分则不随时间变化。如果我们现在根据MPS指标即靠下的连续曲线来比较两条增长轨迹，那么突进方式似乎增长得非常快。但是，如果我们按照SNA指标来测度并比较上面的两条虚线，它们之间的偏离则小得多：图13中物质产品较慢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被服务较快的增长所抵消*。

如果只考核工业生产而不是全部社会生产的话，有利于突进的偏离甚至会更大。突进使运输、建筑和贸易同工业发展相比退到次要地位。如果只限于对狭窄的领域做比较，这些部门就会被忽视。

虽然指标的选择有重要的作用，但我不想使问题仅限于此。让我们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概念选择一个综合产出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

*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一种经常出现、但在我看来是错误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用MPS还是SNA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研究匈牙利经济的实际时间序列时，这两种指标能够得出同样的增长率。

但是这种说法要成为正确的，必须以我们讨论的是图14中描述的情形，即服务所占的份额或多或少是不变的为条件。

上述意见应当从逻辑上反过来。如果在研究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几十年较长时期的增长时，我们发现用SNA和MPS指标计算得到的是同样的增长率，这就表明该国的增长是不和谐的，该国的服务业没有和谐地增长（即没有按超过产品生产的速度增长）。

我只能重复前面的陈述：突进的方式比和谐的方式增长得更快，即使用上述指标度量也同样如此。

这种情况可以用两个几乎是常识性的原因来解释：首先，突进的体制同非强制的、和谐的增长相比，国民收入中消费的份额相对较低，而投资的份额较高。由此而增加的投资会提高增长率，尽管超过一定限度，投资的边际效率会递减（但仍有正边际效率）。

第二，就突进而言，投资集中在资本—产出率高的部门（即重要是工业投资），而资本—产出率低的部门长期被忽视，相当一部分被推迟发展。属于上述部门的有交通运输、住宅建设、公用事业、商业和服务业。

我们可以借助“牺牲、延期和忽视”这三个概念来解释突进中高增长率的原因：牺牲释放出支持生产性目标的资源；而通过延期和忽视，可以把投资集中于能直接促进最大限度增长的那些部门。

但是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当然绝对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它取决于政治因素，即人们愿意在多长时间里做出多少牺牲。历史经验表明，在过长的时期内让人们承受过大的牺牲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困难。

但是不只是牺牲的政治后果会引起问题，而且被延期的工作会积累起来，并迟早变为忽视。这些会导致经济摩擦，损失，甚至严重的震荡，如，震撼整个经济的

能源短缺，影响全城生活的缺水，以及交通中断等等。生产组织得越糟，生产效率越低，工作纪律越松懈，强制的增长率就越快地导致资源耗尽。

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出现过这种情况），强制的高增长率突然放慢。但是更典型的是增长率逐渐慢下来。也许这种情况同经济政策的意图和推动增长率提高的努力恰恰相反。

一辆汽车高速行驶在平滑的公路上，当到达一个山坡时，一个不好的司机可能抱有一种错觉，他只须踏油门就可能保持原有的速度*。其结果：引擎开始发出杂音，不久就会熄火。一个好司机知道应当做什么：他放慢车速。这样他就能保证引擎有足够的力量过斜坡。这样做虽然会使行车速度慢一些，但比较稳妥，不必冒熄火的危险。

这种“向回转换”将是下一章的主题。我们在本章是笼统地谈论不和谐，现在我们将转入更具体地分析匈牙利经济。

* 这个比喻借自F·亚诺希，这里作了某些修改。

第六章 从不和谐向和谐轨道转变中的匈牙利

6.1 和谐要求的满足：12条要求

在匈牙利，突进的经济政策以极端尖锐的形式在一段比较短的时期——4年或5年——中占据优势。主要的政治团体、党、政府和经济学家早在1953年就已经开始批评早期的经济政策。^{*}从那时起，认为没有必要追求或抬高增长率的思想一直反复得到证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过紧的而是稳妥的、现实的计划。

近15年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朝和谐增长轨道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

因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此进行彻底的评价。我们只能

^{*} 官方术语使用了若干词来描述我称为“突进”的这组现象：“强制抬高增长率的工业化”，“过紧计划”，等等。亚诺希（34）的一篇论文采用了另一个词：他认为，在那些日子里，匈牙利虽然力求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但只获得“准发展”。

简略地考察一下目前匈牙利的经济形势。我们将依次提出和谐增长的要求。我将主要强调从本文观点来看值得注意的特点：和谐和不和谐。

(1)提高消费。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出现了最具实质性的变化。在突进的时期，物质消费停止，甚至在短期内急剧下降。但是在最近15年中，上升从未中断过，既没有出现停滞也没有出现过倒退。

从1960—1969年这10年中，人均物质消费总计增加了40%，相当于每年递增3.4%。^{*}

(2)按比例满足消费者需要。在这15年间为消除比例失调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甚至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这个要求已被满足。

住房条件的改善低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提高所能保证的程度。我们落后于“国际主流”所证明的合理水平。为了跟上“主流”，我们必须在住房建设方面赶上发展水平与我们相似的国家。遗憾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等发达国家组中有几个国家，与它们相比，我们的相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这一点上，刚刚开始执行的五年计划给人以希望，因为它大大增加了住宅建设。

在满足消费者的运输需要方面，差距也很大。不过

^{*} 资料来源于中央统计局出版物(72)。

这一点将在后面谈到第七条要求时进行分析。

同样，物质和非物质服务的发展还不够快。我们只要想一想耐用消费品维修服务网点的落后状态就行了。但是，这并不是匈牙利特有的现象，而是几个国家都有的不和谐现象。

(3) 有刺激力的和平等的收入分配。匈牙利经济学家对这种形势的评价并不一致。它可能确实有了改善，但是在匈牙利收入分配中不可能找到会严重影响各阶层人民的引人注目的矛盾。

(4.1) 充分就业。这一点（在突进时期和此后）一直得到彻底的保证；这是我们制度的主要成就。

(4.2) 保健。我们可以列举许多成就，主要有，社会保险实际上是普遍的，连同对全体居民的免费或低价的医院治疗。但是存在着比例失调。在这里只提两种情况。在按人口平均的医生数目方面，匈牙利在欧洲显赫的占第九位。但是与此相比，在按人口平均的医院床位数方面我们就落后了：在这里匈牙利只占第十七位。

“延期”的方面之一就是医院的建设。*

(4.3) 养老金。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养老金制度。确实，养老金的水平是中等的，但是，国家组织照顾老年人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成就。

* 资料来源于人力和生活水平长期计划委员会出版物（25）。

(4.4) 公共安全。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抱怨理由。公共安全实质上比许多较富的国家要好。

对于要求4.1—4.4，可以总括地说：我们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环境安全方面的成果是相当大的。这个因素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经常被忽略，这种比较只注意一两个量的指标（为人均消费等等）。

(5) 自由施展才干的可能性。在这里也许很难找到一个综合的“标准”。在满足这些要求时，伟大的成就与可悲的忽视混杂在一起。我只想强调最重要的成果：免费教育。这是使我们的年青人能够从共同的起点出发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一点由许多其他措施加以补充。然而我们不能说，机会都是均等的，一种职业对每个人都是可以得到的。毫无疑问，在文化不高的家庭中受教育的年轻人，父母对额外课程、学习语言、购买书籍只能提供少量资助，以及能够为其发展前途辅平道路的熟人很少，等等，这样的年轻人开始时仍会碰到障碍。但是这会引出一系列可能超出本文范围的问题——我宁愿指出问题的存在。

(6.1) 教育的迅速发展。这种形势的特点是，一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延期和忽视。因此，例如，教师的薪金水平比较低就是一个忽视，这个忽视长期下去恐怕会在并不充足的教员需求选择方面，以及最终在教育质量方面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在教育

投资方面，在建设设施的更新和发展方面也存在差距。根据与匈牙利目前形势相应的发展水平，大约国内生产总值的4.5—5%要用于教育，但匈牙利没有用这么多。*

(6.2) 生产对合格人员的需求与合格人员存量之间质的和谐。从农村向城镇的快速流动逐渐停息。生产开始消化近几十年间进工厂的“原”劳动力：他们现在正在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朝和谐前进了许多。

(7) 在非竞争性生产中的结构比例性。与本文前面部分一样，在这里我不论述与进口竞争的那部分生产。这个问题与国际分工、专业化和自给自足问题的关系最密切，我的论文没有包括这些问题。因此我只对单独一个部门加以评论，这就是运输和交通。无疑，它大部分属于非竞争性生产的范畴。我们可能进口汽车或飞机，但是公路、加油站、修理厂、轨道、机场必须在这里，在匈牙利。

除了住宅建设，这也是出现我称为“延期”现象的主要领域。全世界，包括匈牙利在内，出现了有关汽车的很多观点。一些人对它的发展很高兴；而另一些人很愤怒，并把它看作我们时代最有害的趋势之一。假如运输需求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

* 资料来源：J·科瓦奇的著作（44）和论文（11）。

以减慢。^{*}但是，这种趋势迟早会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数量也会增加。马拉货车已被卡车所取代，在火车与卡车的竞争中，从某些观点来看前者有实质性的缺点，所以后者的比重必然增加。

在匈牙利，汽车的数量在快速增长，虽然与国际“主流”相比我们很落后。这一点在图15**中得到说明。但是实际上，最严重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增加——即使是突然地增加——汽车的数量很容易。如果国内生产落后，这只是一个外汇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由补充汽车的其他必需设施引起的。正是在这里，目前在现有汽车存量下已经出现了短缺。在这方面包括维修网点和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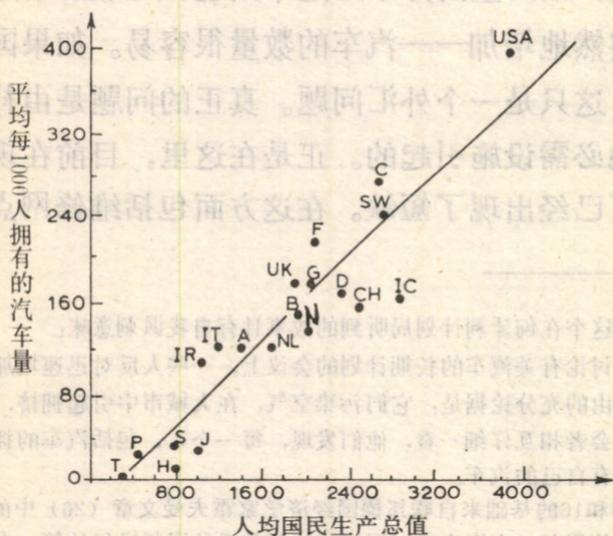
^{*} 下面这个在匈牙利计划局听到的故事具有自我讽刺意味：

在一次讨论有关汽车的长期计划的会议上，一些人反对迅速增加汽车的数量，其理由的充分论据是：它们污染空气，在大城市中引起拥挤，等等。但是，当与会者相互仔细一看，他们发现，每一个人，包括汽车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有自己的汽车。

**图15和16的基础来自联邦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文章(26)中的相应图表。霍夫曼使用了21个资本主义国家1966年前后的资料进行计算。在图15的情况下，未作任何改动就采用了霍夫曼的图表，而且回归直线也是他计算的，后来我在图上标出了匈牙利1966年的位置。在图16的情况下，采用了霍夫曼图中的点，我计算了这些点的回归直线并标出了匈牙利1966年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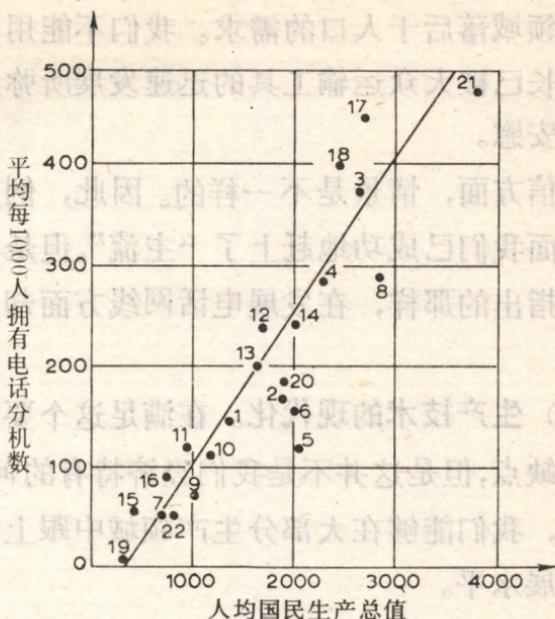
我必须承认，由于使用了这两幅图，我在某种程度上与本文前面的推论发生矛盾。即，霍夫曼在这里把标准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作为发展的尺度，虽然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它可能提供多少有点片面的图景。但是我希望这种前后不一致不会引起误解。由于缺少更好的指标，这两幅图便以目前这种形式来描述这个重要领域的相对落后状况。

件贮备、加油站网点、交通灯和标记，以及最主要的公路。公路建设占用大量物质资源。这项工作在我们国家多年来没有提上日程，而且忽视还在继续。我们在公路上花的钱要比我们应当用加速公路建设规则赶超的国家少得多。因此，例如，瑞士在公路的建设和保养上花费



- | | | | |
|-------|--------|-------|---------|
| A—奥地利 | G—联邦德国 | NL—荷兰 | CH—瑞士 |
| B—比利时 | IC—冰岛 | N—挪威 | T—土耳其 |
| C—加拿大 | IR—爱尔兰 | P—葡萄牙 | UK—联合王国 |
| D—丹麦 | IT—意大利 | S—西班牙 | USA—美国 |
| F—法国 | J—日本 | SW—瑞典 | H—匈牙利 |

图 15: 汽车数量的“主流”



- | | | | |
|--------|--------|--------|---------|
| 1—奥地利 | 7—希腊 | 13—荷兰 | 19—土耳其 |
| 2—比利时 | 8—冰岛 | 14—挪威 | 20—联合王国 |
| 3—加拿大 | 9—爱尔兰 | 15—葡萄牙 | 21—美国 |
| 4—丹麦 | 10—意大利 | 16—西班牙 | 22—匈牙利 |
| 5—法国 | 11—日本 | 17—瑞典 | |
| 6—联邦德国 | 12—卢森堡 | 18—瑞士 | |

图 16 电话分机数量的“主流”。

国内生产总值的2.7%，联邦德国花费2.6%，芬兰花费2.2%，而匈牙利只有0.9%。^{*}

全世界的城市大众运输工具都很拥挤，因此不值得把我们的情况与“主流”相对比。但是必须指出，我们

^{*} 资料来源 (70)。

已在若干领域落后于人口的需求。我们不能用汽车数量的缓慢增长已被大众运输工具的迅速发展所弥补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

在通信方面，情景是不一样的。因此，例如，在发展电视方面我们已成功地赶上了“主流”。但是，正如图16清楚地指出的那样，在发展电话网线方面却存在极大的差距。

(8.1) 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在满足这个要求时确实可能发现缺点，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经济特有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在大部分生产领域中跟上我们增长的一般发展水平。

(8.2) 质量改进。确实，这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虽然我们许多产品的质量改进了，但仍有很多正当的抱怨。突进时代残留最久的现象之一就是质量落后于生产的数量增长。

(8.3) 科研和开发的促进。这方面的形势与要求8.1中提到的类似：虽然可能存在局部的比例失调，但一般来说，我们在支持科研方面并不落后。质量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改进不是由于可能忽视了科研，而是主要应当由市场均衡长期被破坏，以及经济控制和刺激制度中的缺点来解释（见第七章和第八章）。

(9.1) 国际收支平衡。出口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高涨接着便是衰退。我们未能持久地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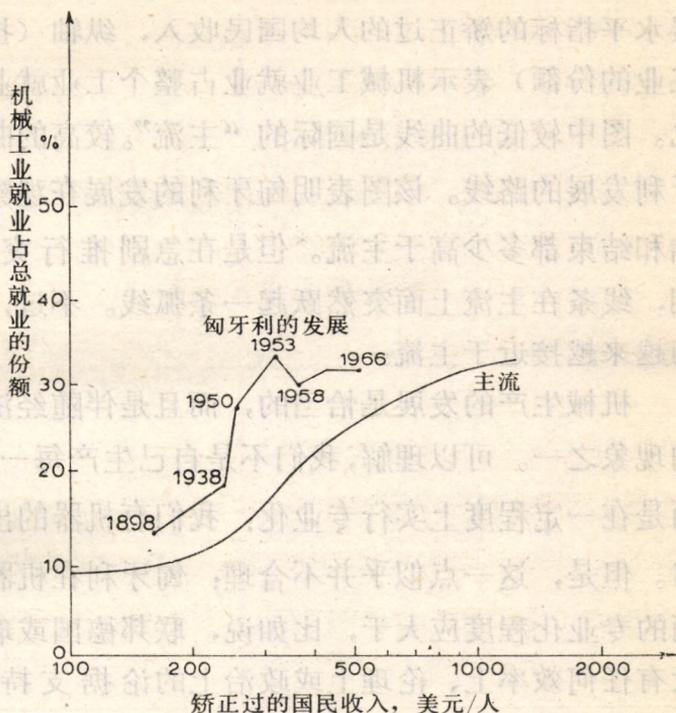


图17 机械（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

我们的外贸困难。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面临“延期”问题：虽然现在不断地决定解决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最终要拖到下一年。

(9.2) 出口与生产之间质的和谐。在这方面，我要引证一篇考察匈牙利机器出口形势的分析文章*。这个分析的主要结果表示在图17中。横轴表示作为一般经济发

* 这个研究是Z·拜凯尔进行的，她的结果概括在文章(5)中。对分析的阐述和数字都是取自该文的。

展水平指标的矫正过的人均国民收入，纵轴（指出机械工业的份额）表示机械工业就业占整个工业就业的百分比。图中较低的曲线是国际的“主流”。较高的曲线是匈牙利发展的路线。该图表明匈牙利的发展在观察期的开始和结束都多少高于主流。^{*}但是在急剧推行突进的时期，线条在主流上面突然跃起一条弧线。不过，后来我们越来越接近于主流。

机械生产的发展是恰当的，而且是伴随经济总增长的现象之一。可以理解，我们不是自己生产每一种机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专业化：我们有机器的出口和进口。但是，这一点似乎并不合理：匈牙利在机器生产方面的专业化程度应大于，比如说，联邦德国或瑞士——没有任何效率上、伦理上或政治上的论据支持这种观点。

如果考察的不是机器生产，而是向发达国家的机器出口，画面就不同了，在这后一个方面，匈牙利的数据紧随国际主流曲线之后；我们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机器既不比类似发展水平上的其他国家多，也不比它们少。这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解释：增加产出量或多或少是一个决策问题。如果我们建立更多的机器厂，生产就会扩大。

^{*} 拜凯尔的注文用单独一条曲线而不是一条带状线来描述主流。如果用一条沿着曲线的带形线来表示它，结果可能是，匈牙利路线的起点和终点落在这条带形线上或离它不远。

当然，向发达国家出口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匈牙利机器的质量。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强调过的，质量的改进是一个“有机过程”。它不可能单用决策就突然改进：为此，技术教育、工作程序、能力都必须刻苦和耐心地改进。

在机械工业的场合，图17表明出口和生产的质量格局都逐渐趋于和谐。这一点对别的工业也是确实的，它可以被视为一般的趋势。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实际上已接近于满足和谐的要求。

(10) 对可以再生产的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很难构成一幅综合的图景。但是，看来在迅速建成新项目的同时，对现有旧住宅、公共建筑和公路的保养，以及在若干工业部门中对旧机器和运输工具的维修仍然很落后。

(11) 对自然的保护。我们已经达到了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成为真正的危险。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犯了少数错误，也许还没有造成最终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也不能说每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都已被用于保护自然了。只提一个例子：尽管我们仍处在工业发展和汽车普及的中等水平，但就空气污染来说布达佩斯已居于世界的“前列”。将来，自然保护需要大量资源。

(12) 对储备的不断关心。虽然短缺在一些领域已经减轻了——与突进的高峰相比——它们仍然可以普遍

感受到，在消费品市场和生产领域，尤其是投资品市场上，供给经常落后于需求。这种现象将在第八章单独讨论。

6.2 满足和谐要求：总结

依次看完12条和谐要求以及它们在匈牙利的满足程度如何后，我们现在用表4来总结一下我们的阐述。它的结构与确定“纯粹”类型突进的表3是一致的。在表4中，只有在一条或另一条和谐要求至今，即在70年代尚未得到满足的地方才能划叉号。把两张表对照一下，就可以证实（如果只是以一种高度概括的和简化的形式）我们在什么方面还在遵循“突进”路线，在什么方面已经离开了这条路线。

与1949—1953年这段时期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满足了要求1. 消费在稳步地大幅度增长。这是十分重要的。单有这一个变化就足以确保使近15年的经济发展不被认为是古典意义上的“突进”。

与此同时，还不能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已转入和谐增长的轨道。仔细地比较一下表3和表4，我们可以确信，还有极少数要求甚至在今天也没有得到满足；也许我们在某些项目下只看到一个而不是两个叉号，但是在我们发现叉号的地方，形势甚至在今天也符合“突进”

表4 目前对和谐要求的满足

序号	和谐的要求	牺牲	延期	忽视
(1)	提高消费。			
(2)	按比例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	××	
(3)	有刺激力的和平等的收入分配			
(4.1)	充分就业			
(4.2)	保健		×	
(4.3)	照顾老人			
(4.4)	公共安全			
(5.1)	社会对培养儿童的贡献			
(5.2)	受教育的机会均等			
(5.3)	流动性			
(5.4)	妇女的社会平等			
(5.5)	增加闲暇时间	×		
(6.1)	迅速发展教育		×	
(6.2)	生产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与专业人员供给之间质的和谐			
(7)	在非竞争性生产中的结构比例性	×	××	
(8.1)	生产技术的现代化			
(8.2)	质量改进	×	×	×
(8.3)	科研和开发的促进			
(9.1)	国际收支平衡		×	
(9.2)	出口与生产之间质的和谐			
(10)	对可再生产的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	×	×	
(11)	对环境和自然的保护		×	×
(12)	对储备的不断关心		×	

的典型特征。

15年来，匈牙利一直处在从突进向和谐增长轨道转变的状态。但是这个转变是缓慢的，在许多细节方面是不协调的，甚至于故态复萌；种种旧的延期和忽视还在

继续。转变确实没有计划；它充满了匆忙凑合的东西，即迫于旧弊病的压力所采取的措施。

对于这些评论，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转变的进行是胆怯的和笨拙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两难矛盾：“和谐灵魂”与“增长率灵魂”之间的冲突。在上一章末尾，在进行比较时采用抽象的方式用一般术语提到这个矛盾，即“纯粹”和谐的与“纯粹”强制的轨道。但是现在，对匈牙利目前形势的具体分析要求我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关于15年计划的最后决定。已起草的材料和迄今所进行的讨论都反映了这种冲突。和谐的愿望以上百种形式表达出来。但是看起来我们似乎避免正视它有可能导致降低总量指标增长率这一事实；我们似乎羞于落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增长率之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这一代或下一代人都不會——更谈不上历史了——用所取得的增长率来评价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而更多地是用我们能否成功地使匈牙利经济协调和稳固，使人民更加满意来评价。

6.3 转变与增长率

在上一章末尾，我力图指出，如果——在思想实验

中——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从相同的初始状态出发沿两条轨道前进，在和谐轨道上的总量指标增长率将比突进轨道上的增长率低。

但是现在，我们不打算比较两条假设的轨道，而是寻求回答下述问题：转变对增长率有什么影响？从逻辑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要从强制增长轨道转入和谐轨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要选择较慢的轨道，而且在转变时期，外加的刹车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简单的论据：在突进情况下国家把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公路建设，在和谐增长的情况下它将花费2%。但是，如果它花了20年的1%，现在要转入和谐轨道，从长期来说，它为了“赶上”必须花费2%以上，除了完成应当完成的任务外，还要完成那些被延期的任务。公路建设属于那种产量/资本比率特别低的投资。因此，如果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不是花费1%而是2.5%——不是用这些资源去制造能够建设产量/资本比率很高的工厂的机器——生产的增长率无疑将会减慢。

在这里值得考虑一下匈牙利的某些资料。让我们取匈牙利工业和农业的产量/资本比率为衡量单位（根据匈牙利统计学家的术语：按1968年价格计算的1969年的国内总产值除以按1968年价格计算的到1969年1月1日的

固定资产总价值*)。这个指标值在水的管理方面是0.07,在运输交通方面是0.14,在个人服务和住房方面是0.04。显然,向这些部门转移的投资越多,国民经济的平均产量/资本比率减少得越多,这就是说,增长率必然会减慢。

伴随向和谐轨道转变而来的减慢是结果,而不是目标,也不是手段。它不是目标:我们不减慢是因为我们宁要适中的速度而不要很快的速度。它也不是手段:单纯使经济减速我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如果每一项活动都比以前更加慢慢吞吞,我们丝毫也不可能接近和谐。某些过程必须减慢,而其他过程(如消费资本的形成,落后的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发展)必须加快,这就是说,活动和资源归根结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合。

在转变时期,总量产出指标的增长是否必然要减慢?

弥补延期和忽视肯定会影响减速的方向——至少在大部分领域。对这种影响多少能够作出可靠的预见和计划。

与此同时(就相当大的部分来说,作为一个独立的过程)效率改善能够在我国出现。象5.1节那样,在“效率”标题下,可以纳入多种因素:经济决策的合理化,

* 资料来源于中央统计局出版物(72)。

工人的勤奋和劳动纪律的加强，经济生活有条不紊的运行，等等。如果所有这些都得到改善，它当然有助于增加总量产出指标。消除比例失调，比较始终为一地满足和谐要求，本身就有助于提高效率，虽然这种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表现出来，以致于很难“抓住”。

当然，经济管理部门不要消极地等待效率的发展，而是必须采取一些办法来推动改善。计划的任务是由参与详尽阐述必要的措施所构成的。但是，很难用可靠的办法从数量上计划旨在改进效率的措施的预期影响。

归根结底，对今后15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是多少这个问题不可能给予精确的和明白无误的回答。*我将只限于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预测：

(a) 如果我们完全始终如一地实行向和谐增长轨道的转变，与此同时效率没有比原先得到改善，总量产出指标将大幅度下降。

(b) 如果我们完全始终如一地实行向和谐增长轨道的转变，同时效率得到明显改善，这多少会抵消转变的减速作用。即使在这种场合仍可能有一些减慢：我们很难指望增长率有真正的加速。

(c) 有时，即使效率没有大的改善也能维持目前

* G·楚柯尔(2)的一篇论文正是根据这个理由指出，经济增长率不一定列入构成一个目标的任务之中，但是增长率是旨在完成计划目标的计划计算的结果之一。

的增长率，假如我们继续处在和谐轨道与突进之间，甚至有时靠近后者的话。它甚至有可能维持15年——不过对更遥远的未来来说后果确实非常严重。但是，很大的可能性是，即使在下一个15年中也不可能继续实行这种政策而不招致巨大损失和打击。

就我来说，我建议抛弃选择（c），并在长期计划过程中权衡选择（a）和（b）。它们反映了相同的经济政策：首尾连贯地向和谐轨道转变。它们只是在效率预测方面不同：但是在这方面，同时计算较多和较少的最优变式都是合理的。

当就本文提出的观点进行讨论时，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诚地希望实现全部12条和谐要求，这岂不是要求得到只有用较高增长率才能创造出来的资源量吗？“我们为放弃突进而突进……”

这个警句是机智的——但是错误的。转变不可能一夜就完成。多年被延期和忽视的任务不可能突击一下就解决；转变必然是渐进的。过去的15年之所以应当受到批评，不是因为转轨的渐进性，而是因为这种转变不连贯。

很可能在一个15年期间内完不成一次彻底的转变。那么好吧，就用它20或25年。实质性的东西是，我们对转变应当有确定的观点。让我们作出逐渐但连贯地地理顺经济进步前缘线的计划；让我们为自己规定一个完成转

变的最后期限——即使这个日期很遥远。

我不敢把这一点说成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每个国家的普遍观点。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可能存在着使突进成为合理的外部 and 内部环境。但是我相信，在一个象匈牙利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已经取得的中等发展水平上，在70年代前期比较适宜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完全有理由建议向和谐增长轨道进行首尾连贯的转变。

6.4 转变与生活水平

在讨论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担心本文提出的观点会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我的反对者在辩论中提出如下论据：我们希望使匈牙利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此目的，必需使生产迅速增长。因此，如果有人反对高增长率，那么归根结底他是在阻碍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得以实现。

这种推论可能在几方面受到抨击。

首先，它暗中假定消费对投资的比例不变，甚至在后者的份额增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这不是强制的。目前在匈牙利经济中投资率已经很高。值得考虑一下——至少作为计划变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消费的方向逐渐转移的情况。它甚至有可能促进投资效率的改善。看来我们似乎很难提供足够的有组织的

生产能力和第一流专家来应付加速扩展投资活动的任务。*

但是，现在让我们不考虑消费对投资的比例。我确信全体居民的物质满足——现在不谈影响他们幸福的非物质因素——不只是消费总量，消费流量的函数，而且也是其他因素的函数：

消费存量怎样发展？这个问题与消费与投资间的比例，即总投资中生产与消费资本间是什么比例的古典两难矛盾几乎同样重要。

在评价消费流量与消费存量时，不仅它的总量而且它的构成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低估消费总量、人均消费流量的重要性。我把它的不断增长列为和谐的第一个要求，这不仅仅是巧合。我并不建议，为进行任何“前缘线调整”都应把消费流量降低到在要求1中说明的水平以下。这就是说，它在长期内至少应当保持在年平均2—3%，如果有可能还可以更高。

假定必须在以下两种选择之间进行取舍：

第一种选择：消费流量每年增长3%，同时更加充分地满足被延期和忽视的要求，以及消费资本形成方面的赶超；消费流量与存量间较好地按比例发展；短缺消

* 这种现象与H·霍尔瓦特称之为制度的“投资吸收能力”有关。见(27)。

除。

第二种选择：消费流量每年增长5%，同时已被延期和忽视的要求进一步被延期；消费资本形成方面继续落后；消费流量与存量间继续比例失调；短缺现象继续存在。

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第一种选择。我相信，如果这个选择的经济内容得到充分的证明，大多数匈牙利人都会采取相同的立场。

在谈论这两种选择时，我们已经涉及到下一章的主题：短缺现象，即不均衡问题。

第七章 非 均 衡

本文前六章已经探讨了计划的制订和经济政策，但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计划还必须付诸实现。

虽然这篇论文的绝大部分内容讨论的是计划，但我却并不愿意过高估价计划在实际经济运转中的作用。我们如果把新近结束的5年计划和目前正在执行中的5年计划的结果与这两个计划本身进行核对比较，就会发现当处在突进增长与和谐增长的中间状况时，计划本身比计划的执行情况更接近于和谐。

突进现象与一个总想戒烟的瘾君子的处境有些相似：他几次三番下决心再也不吸烟了，可最后却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论文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全面探讨计划与计划执行情况之间的这种背离，我将只就第七、八章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考察。

7.1 投资紧张

反复陷入突进错误的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连续超前”投资。这一现象能够直接在实物形态上观察到*。一方面，需求必要的投入，是由被采用的投资决策决定的。随计划而产生的一系列物资投入成为必需：开始是事先规划工程的活动，从修筑建筑物到机器设备的国内制造或进口，以及机器设备的安装。另一方面，可能性却是既定的。生产潜力适应着能使投资得以执行所必需的产出：建材业和建筑业的生产能力、设计机构的设计能力以及可供投资目的使用的外汇额度，等等。

在匈牙利，长期以来对于投资品的需求总是大于供给，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是投资紧张。

虽然这种不平衡自然也有着金融方面的反应，但到目前为止我所强调的只是它的实物方面的问题。最初几年，金融方面的反应起不了多大作用，大部分投资决策是由中央承担的，重要产品是以实物形态进行分配的。

* 投资市场紧张的问题见J·德雷琴(14)和I·拜伦德(6)，走访J·德雷琴和G·道尔瓦什(国家计划办公室)，引起了我对于这一问题中的主要观点的重视。

但是近些年来,尤其自从1968年*的经济控制与管理改革开始,金融方面对于投资的影响加强了,一些投资决策分散到各级机构去制订、执行了。项目资金中,从国营、集体企业利润中筹集的部分,从下级政府部门(如地方议会)财政中取得的部分,以及来自公共储蓄、银行贷款的部分增加了。在金融领域中,投资紧张的含义是:在目前购买力主要面向投资品的情况下,以正常价格计算,对投资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大于它们的供给。市场上对于投资品的过度需求推动着价格上涨。虽然政府的价格管制努力平抑物价,但上涨是无法阻止的。

若干方面的力量促使着投资需求的增加。这一过程甚至在计划阶段就开始了。当草拟目前正在执行的5年计划时,最初的规划要求投资总额每年增长6—7%,在制订过程中产生了变化,提出了以加强经济的自我控制和4%的发展速度为目标。但在最终文件上,发展速度被订为5%,这个速度并不算低,可那些制订计划的人们几乎都为它感到难为情,并就此事为自己提出辩解。然而,计划的执行情况却对他们给予了肯定,并且完成了更多的投资。

中央的投资决策经常是过于雄心勃勃的。另外,“来

* 描述、评价改革的文献(包括外文文献)是极其丰富的,有些著作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普遍的看法。R·涅尔什(55), (56), (57), I·弗里什主编的文集(20)以及T·纳吉(49)。

自下面的压力”是极强的。每一项投资活动的必要性和不可拖延性都有大量的论证来支持。但是，经济领导部门经常面临的并不是论证，而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地方领导许了愿而政府却要用投资来还愿。还存在着另外的因素：由地方财政（自治政府或企业）自筹的投资问题。在制订计划时，最初的假设是企业利润（同样，税收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其他财政收入）将会达到一般水平。当财政收入高于平均水平时，就会产生超计划的更多的投资。但是，如果财政收入低于预计水平时，投资却不会停止或是放慢步伐，而是向中央紧急求援以使原先的计划能够完成。

这样，形势是在一种两难的局面中发展着的。国家的中央机构不能有片刻的撒手不管和消极观望，这是因为资金的匮乏，某些项目开了工却无法完工。但是很明显，中央的这种干预，不加选择地提供帮助和贷款，导致了投资紧张、排队求购投资品和劳务，物资和劳动的短缺，导致了财务分析意义上的投资活动的延期，也导致了未完工投资存货的膨胀。

7.2 “吸纳”

在投资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的不平衡是核心，它是一组更为广泛的现象的起点：供求之间的一般非均衡。投

投资市场的划分并不是从当前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品的非投资性质，或者从消费品的角度来进行的。那些被允许修筑厂房或盖居民住宅的人们，竞争的是同一个建材业和建筑业的生产能力。用同一外汇额度，我们可以进口生产效率高的机器设备，也可以进口收音机、服装或者香水。

在匈牙利，并不仅仅是投资者在排队等待，其他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短缺。在现实的生产中，物资、备用件、中间产品、劳动以及外汇方面的短缺经常造成各种困难。消费者也在排队等候着得到住房、汽车和安装电话分机。时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一大宗消费品在总量供给上是充足的，而其中的具体产品、产品的规格和型号却又存在着令人烦恼的短缺。

近年来，匈牙利消费品市场的供应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浏览一下商店的橱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主要食品和群众消费品的供应是稳定的。由于国内生产的发展、进口的增加，商品的供应已经相当充足。这一进展可以用多种因素来给予解释：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在稳定供应的利害问题上慎重地制订中央的政策和进行干预。总的来讲，是因为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匈牙利的经济生活，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看成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来抓。

尽管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即便不涉及上面谈到的厂商和投资品市场上的紧张，宣布在消费的每一方面都已经成功地消除了短缺也还为时太早。另外，在论

文的这一部分，我将不局限于分析目前匈牙利的情况，而是在更一般的形式上来谈一下短缺现象以及它们与突进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突进不仅仅存在于当前的匈牙利，而且具有共同的更普遍的性质。

这些现象已经被赋与了许多名称。在德语文献中，我们看到过 Mangelwirtschaft 即“短缺经济”，传统价格理论和均衡理论把它简单地称作过度需求，另外一些人则使用“卖方市场”这一术语，它与“买方市场”的情况正好相反，强调在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下，卖方控制着市场而买方只能任其摆布。

作者最近写了《反均衡论》一书，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是市场的非均衡。在这本书中，我把普遍（或非常广泛）的短缺状况称为“吸纳”。在这种状态下，买者渴求吸纳一切他所碰到的商品。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挤压”，即卖者把他的商品强挤给买者。

为了避免与那本书重复，这里我就不准备详细地描述吸纳和全面讨论它的起因和结果了，而只是就与本论文主题即突进与和谐增长有关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我们已经有了两组从概念上进行区分的现象：“突进”是一种经济增长的可能途径。如果我们想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采取了这样的发展道路，那就必须依次考察它

* 见(42)，(43)，在我的书中，说明了提出使用新术语的必要性。“挤压”和“吸纳”状态与新古典价格理论的过度供给、过度需求是不同的。

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见和谐的12条要求),而“吸纳”则是市场的本质状态,是非均衡市场的一种形态。

尽管“突进”与“吸纳”是不同的概念,历史上它们却通常是紧密相联、互相促进的。可以在广泛的范围内考察“突进”与“吸纳,”追溯到它们的一般动机。它们在相互加强,甚至产生作用的方向都是相同的。

我们从动机入手开始进行分析。象我们在本章开篇所强调的那样,市场非均衡的起点是投资市场的紧张。一般来讲,这种紧张的根源与产生突进的原因是一样的:经济中盛行的扩张势力,以及急不可待的连续超前所产生的需求。

这两组现象在金融领域中有着密切的关系。突进需要大量投资,这部分资金一定程度上是在购买力膨胀即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筹集的。另一方面,政府的价格控制却又制止物价上涨,这样,压抑的通货膨胀导致了过度需求,导致了“吸纳”。

最后,“吸纳”作为“突进”的先兆,作为“突进”得以持续盛行的环境,可能是这二者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如果“挤压”在市场上居主导地位,企业就只能生产使用者实际需求的产品了。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企业去发展那些能让使用者、消费者、买方感到舒适和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在普遍挤压的情况下,适应性的失调会

立即以存货膨胀的形式，在相对价格的突然变动中产生。

在“吸纳”状态下，情况是不同的。与最灵活的价格体系相比，普遍的商品短缺能够更有把握地使市场上的商品被抢购一空：因为买者愿意买进任何商品，所以他什么都要。他无法对狭小的商品进行选择，无法对低劣的产品质量提出任何异议，而只能接受、认可买得到的东西。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状况是衡量为肃清突进而作出努力的良好尺度，它与所作出的努力程度是一致的。在消费品市场取得的成功，说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有可能向和谐增长的轨道迈进。但是，只要在主要领域中存在着投资紧张、吸纳以及非均衡，我们就仍然只是处于强制增长速度与和谐增长的中间状态，而没有坚定地走上和谐增长的道路。

7.3 题外话：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辩论

这里，我想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支持者们进行有关的辩证*。在动手写这篇论文之前，我曾再次拜读了他们的一些主要著作。对于一个匈牙利经济学家来说，

* 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赫希曼（25）以及斯特里顿（64）。

这些著作使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它们赞扬了使匈牙利工作人员感到困扰甚至是气愤的每一种因为抢购物资或者由于家庭主妇们所造成的现象。“不平衡增长”是美化吸纳的理论。我不想因为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或因为所有国家在每一发展时期的不同情况就无条件地丢弃他们的主要观点。E·G·赫希曼一直受他在哥伦比亚的经验的影 响，而我却没有到过那里。吸纳在一个懒散昏睡的国家中很可能产生一种推动力量。投资规模过小；缺少有事业心、进取心的人来组织经济活动；对投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鼓励。在这种情况下，短缺状态可能是有益处的，他能 使企业在迅速消除短缺的过程中有利可图。短缺所造成的不满对政府和各部门机构产生了压力，推动着政府出面进行干预。

对于一个经济停滞或历尽坎坷至今的国家来说，当它被必然地推向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时，普遍的短缺状态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为“起飞”提供原动力的不可缺少（或者至少是有效）的力量。或许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之后，我们就会承认吸纳在“起飞”时期的这种历史作用了。

然而在今天的匈牙利，我们肯定已经跃过了“起飞”阶段。我们的问题不是昏睡不醒而却是苦于患了失眠症。因此，我深信在匈牙利的既定条件下，运用“不平衡增

长”理论来制订今后15年的计划是错误的。

7.4 储备与适应

谈完离题话之后，我们回到正面的解释上来。

我们讲过的全部关于市场非均衡和强制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最后的分析中，都与和谐的12条要求有关，即对于储备要不断地予以关注。“吸纳”的含义是缺乏储备，“挤压”意味着在生产和流通的每一领域中产生着储备，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生产者感到他只受市场可能性的限制，而就其生产可能性而言，如生产能力、物资储备、劳动力的可获取性等，他实际上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这种感觉驱使着他去发现买者的需要，用介绍新产品的办法去创造新的需求，从而创造新的市场。

储备的形成始于投资资源。这样我们就返回到不平衡分析的出发点，回到投资紧张问题上面来了。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哪怕是最后一分钱的投资资金，都要在计划指定的资金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继而在执行计划时就会产生：首先，任何项目的费用都高于预计数字，这一情况部分是由于价格上涨造成的，部分是由于低估了真正的实际收入。另外还产生了甚至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并没有被列入计划的情况。把这些投资用于项目就饱和了，（同时计划内投资继续执行）而投资紧张

也就产生了。

事实上，任何人都承认，预先把全部投资基金都分配干净的作法并不正确，留一些储备是需要的。产生分歧的只是这个储备的数量应该是多少。不少人倾向于只留1—2—3%的储备。而我的看法是，所需要的储备远比这些数字大得多，不是1—2%或3%，而却是10—20%或30%。当然，储备的数量、未分配资源的数量并不是独立于计划之外的，15年计划比5年计划所需要的数量就更多些，下一年的年度计划需要的储备就应该是更为有限的。

在预先分配投资基金的后面，隐约可以感到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计划哲学”问题：计划制订者的聪明才智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以及预见的极限究竟有多大？从事预先分配全部投资基金工作的人，是不会为任何意外情况所动摇的。而留有储备的人，却认为如果事物发展过程能在事先计划好七成、八成以至九成的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完全信赖颇为细致入微的预见将会是一种自我欺骗。必须允许对生活进行补充，进行调节。如果必要的话进行计划。然而，为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实际的物质投资资源以及流动资本。

在与一些从事实际计划工作的人们谈及这个问题时，我有过多次经验，对于他们来说，中、长期计划应该有一个投资品的过度供给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他们提

出的各种解决方案的目的正是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建议在最悲观的预测基础上制订计划，如果事情发展得比预料的要好，所产生的剩余应被视为储备。或者，计划内的投资活动应该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列。如果资源过于稀缺，那些排在项目一览表末尾处的投资活动就要被取消。虽然这些观点都值得重视，但我认为它们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前面提到过的思想，即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储备方面：如果事物并不如乐观的C或平均的，不太悲观的预期那样有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方面在于，由于相反信号的不均衡，投资市场上将建立新的权力关系。投资品生产者将争取委员会的支持，而投资决策者将争取有首创精神和思想的创新者。

伴随突进的现象之一是僵化、官僚主义束缚。“我们不能改变这一点，决议已经通过了”……或者“它没有纳入计划，没有它所需材料，制定下个计划时我们将尽力把它列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只能白白地看着需要出现某些严重的转移而无法迅速加以调整。有重要发明的创新者出现也没有用——如果采用这种发明需要增加资本的话，人们对他不闻不问，这种发明的采用被推迟。只有用大量储备（其中有适于迅速完成投资的可动用实物资本，多余的投资品供给）来消除短缺造成的紧

第八章 计划与市场对和谐 增长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碰到下述观点：

突进的原因是计划本身。只有计划才能人为地偏离在市场影响下可以很好地自发形成的比例。你不需要到芝加哥去听这种观点，在布达佩斯就有人相信这一点。

拿我来说，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真正和谐的增长是由明智的计划推动的。

第一组论点与下述事实相联系：部分和谐要求根本不会“自发”表现出来，除了在市场的影响之下。

对要求2（有比例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要求6（教育），要求8.3（科研）和要求11（自然保护）的违犯在某些领域中表现为一种所谓的“外部性”。*市场不阻

* 外部性是不（或者不充分地）反映在价格和成本上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不反映在企业或家庭的货币帐目上的影响。例如，工厂发出噪音，干扰了住在周围的居民，但是它不对此“付出代价”，这并没有成为企业的预算负担。

止不利的外部性，也不鼓励有利的外部性——为此需要有意识的干预。

市场不会自动地保证满足要求4.1，即充分就业。自从凯恩斯以来，这一点对每个经济学家——不管政治信仰如何——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有一系列“人道主义的”和谐要求超出了市场的范围：要求3（平等的收入分配），要求4.2（保健），要求4.3（照顾老人），要求4.4（公共安全）和要求5（自由施展才干的可能性）。

另一组论点从预见的实际优越性出发。匈牙利的谚语说得好：“聪明人向别人的错误学习”。完全依赖市场的人希望只是事后向他自己内在的经验学习。如果市场通过特定的信号系统指出相对价格和利润发生变动，这时（也只有这时）比例才变化。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历史已创造了一种特定的局面：大约150个国家生存在一起，各自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除了排在前面的最富的国家以外，其他国家都可以向前面国家的经验学习，既学习好的经验也学习坏的经验。长期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系统地收集这些经验，分析它们，并且在考虑这些经验和不同政府的规范要求时，作出有关和谐比例发展的初步决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市场。在本文的某些地方我在谈到其他内容时已涉及到这个主题。首先，在用抽

象方式确定和谐概念时，我强调指出：增长轨道受到全体人民的控制。只有已被全体人民无保留地接受的东西才能被视为和谐的。市场作为一个震动相当小的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温和的讲坛是必要的。

后来，在第7.4节我曾提到，计划中有很大一部分活动必须留待不断地补充和调整。换言之，这表明市场有可能作为纠正计划的工具来行使职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市场必须安排在计划中未详细配置的投资储备或机动的实际资本。自由流动投资储备或机动实际资本的存在是市场有效运行和发挥补充与调整计划的特定作用的物质条件，这个条件至少与支配企业自主权的法律和制度条件同样重要。

8.2 改革与变化的相互关系

近15年来，匈牙利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期计划设想也在进一步发生变化。变化是多方面的，然而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四个主要趋势：

(1) 与增长有关的经济政策正在变化。我们处在向和谐轨道转变的过程中。

(2) 市场的总的形势正在变化，目前主要在消费品市场上，消除吸纳和短缺现象的最初几步已经迈出。

(3) 制度构成正在变化。短期计划指令体系已被

取消，企业自主权已经扩大，价格机制、利润动机和市场过程的作用日益增长。

(4) 计划方法正在变化。数理计划已经出现，注重主要过程的长期计划已取代过细和短见的细目计划而居于显著地位。短期国民经济计划不再分到企业。

这四种变化是密切相联系的。本文并未彻底阐述这些相互关系，因为它主要论述第一个过程，但是它经常提到相互之间的关系。分别而言，每个过程的实现越是连贯，它就越能推动其他三个过程的发展。

我们这些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人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依赖预感；我们还必须充分讨论这些问题。我希望本文——如果不是以完成的成熟形式阐述，至少是通过促进讨论的形式——对问题的最终阐明作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ADELMAN, I. and C.T. MORRIS: 'Factor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political variables and 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1965) 555-578.
- (2) ADELMAN, I. and C.T. MORRIS: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968) 1184-1218.
- (3) AUGUSTINOVICS, M.: 'A hosszútávú tervezés módszertanához' (Contribution to the methodology of long-term planning). *Közgazdasági Szemle*, 16 (1969) 1168-1178.
- (4) AUGUSTINOVICS, M.: 'A hosszútávú tervezés kvantifikálásáról' (On the quantification of long-term planning). *Közgazdasági Szemle*, 16 (1969) 1269-1281.
- (5) BEKKER, ZS.: 'Néhány gondolat Magyarország gépiparának fejlődéséről' (Some idea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ngarian engineering indust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7 (1970) 1033-1048.
- (6) BEREND, I.: 'A beruházási piac helyzetéről'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investment market). *Közgazdasági Szemle*, 17 (1970) 140-154.
- (7) BRÓDY, A.: *Érték és ujratermelé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69). For translation see (8).
- (8) BRÓDY, A.: *Proportions, Prices and Planning*. Budapest - Amsterdam: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 (9) CASS, D.: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 turnpike theorem'. *Econometrica*, 34 (1966) 833-850.

- (10) CHENERY, H.B.: 'Pattern of industrial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1960) 624-654.
- (11) CRAVERO, R., G. BARNA, Á. KISS, I. MONIGL and J. NAGY: *Az oktatás távlati fejlesztési koncepciója* (Long-term development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mimeographed). Budapest: Munkaerő és Életszínvonal Távlati Tervezési Bizottság (1971).
- (12) CUKOR, G.: *Hosszútávú tervezés az iparban* (Long-term planning in industry; manuscript). Budapest: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e (1970).
- (13) DORFMAN, R., P.A. SAMUELSON and R.M. SOLOW: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 Toronto – London: McGraw-Hill (1958).
- (14) DRECIN, J.: 'Beruházási egyensúly, irányítási és döntési mechanizmus' (Investment equilibrium, mechanisms of control and decision). *Társadalmi Szemle*, 26 (1971) No. 6. 3-13.
- (15) EHRLICH, É.: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consumption indicators expressed in physical units and 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Czechoslovak Economic Papers* (1966) No. 7. 109-136.
- (16) EHRLICH, 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by indicators expressed in physical units'. *Acta Oeconomica*, 2 (1967) 107-148.
- (17) EHRLICH, É.: 'Nemzetközi elemzések a magyar távlati tervezéshez'. *Országos Tervhivatal Tervgazdasági Intézet Közleményei* (1968) No.2., A. füzet. For translation see (18).
- (18) EHRLICH, É.: *International analyses to be used in Hungarian long-term planning. Volume 'A'* (mimeographed).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 Planning of the Hungarian Planning Office (1968).

- (19) EHRLICH, É.: 'Nemzeti jövedelmek dinamikus nemzetközi összehasonlítása természetes mutatókkal' (Dynamic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national incomes with the aid of physical indicators). *Közgazdasági Szemle*, 15 (1968) 191-212.
- (20) FRISS, I. (ed.):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69).
- (21) HAHN, F.H. and R.C.O. MATTHEW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Economic Journal*, 74 (1964) 779-903.
- (22) HETÉNYI, I.: 'Gazdasági fejlődés és hosszútávú tervezés'. *Gazdaság*, 2 (1968) No.4. 7-17. For translation see (23).
- (23) HETÉNYI, 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planning'. *Acta Oeconomica*, 4 (1969) 155-168.
- (24) HETÉNYI, I.: 'A hosszútávú tervezés kérdéséhez' (On the problems of long-term planning). *Társadalmi Szemle*, 25 (1970) No.10. 12-24.
- (25) HIRSCHMAN, A.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26) HOFFMANN, W.G.: 'Prosperity goods in the growth process'. *The German Economic Review*, 9 (1971) 1-10.
- (27) HORVAT, B.: 'The optimum rate of investment'. *Economic Journal*, 68 (1958) 747-767.
- (28) HOUTHAKKER, H.S.: 'The present state of consumption theory'. *Econometrica*, 29 (1961) 704-740.
- (29) HUSZÁR, I., R. HOCH, J. KOVÁCS and J. TIMÁR (eds.): *Az életszínvonal alakulása Magyarországon* (Develop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in Hungary). Budapest: Munkaerő és Életszínvonal Távlati Tervezési Bizottság (1969).

- (30) HUSZÁR, I., R. HOCH, J. KOVÁCS and J. TIMÁR: 'Hypothés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Hungary'. *Gazdaság*, 3 (1969) No.3. 17-41.
- (31) JÁNOSSY, F.: *A gazdasági fejlettség mérhetősége és új mérési módszere* (Measurabilit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a new method for its measuremen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63).
- (32) JÁNOSSY, F.: *A gazdasági fejlődés trendvonalai és a helyreállítási periódusok* (The trend l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66).
- (33) JÁNOSSY, F.: *Das Ende der Wirtschaftswunder – Erscheinung und Wesen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Frankfurt: Neue Kritik (1971).
- (34) JÁNOSSY, F.: 'Gazdaságunk mai ellentmondásainak eredete és felszámolásuk útja' (The origin of present contradictions in the Hungarian economy and the way to eliminate them). *Közgazdasági Szemle*, 16 (1969) 806-829.
- (35) KISS, Á. and J. TIMÁR: 'Szakemberellátás és munkaerő- struktúra' (Supply of qualified labour and manpower structure). *Társadalmi Szemle*, (1970) No.6. 25-38.
- (36) KISS, Á. and J. TIMÁR: 'A munkaerő- struktúra és az oktatás fejlesztése' (Manpower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ársadalmi Szemle*, 25 (1970) No.7. 16-24.
- (37) KISS, Á. and J. TIMÁR: 'The supply of qualified manpower – Labour force structure – Education'. *Acta Oeconomica*, 6 (1971) 201-218.

- (38) KOOPMANS, T.C.: 'Objectives, constraints and outcomes in optimal growth models'. *Econometrica*, 35 (1967) 1-15.
- (39) KORNAI, J.: *A gazdasági szerkezet matematikai tervezése*.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65). For translation see (40).
- (40) KORNAI, J.: *Mathematical Planning of Structural Decisions*. Amsterdam - Budapest: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67).
- (41) KORNAI, J.: *The Place of Mathematical Planning in the Control of the Economic Systems* (mimeographed). Genev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1970).
- (42) KORNAI, J.: *Anti-Equilibriu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71). For translation see (43).
- (43) KORNAI, J.: *Anti-Equilibriu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 (44) KOVÁCS, J.: *Szakképzés és népgazdaság*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68).
- (45) LIST, F.: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asel - Tübingen: Kyklos - Mohr (1959).
- (46) MALINVAUD, E. and M.O.L. BACHARACH (eds.):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London - Melbourne - Toronto - New York: Macmillan - St Martin's Press (1967).
- (47) MCKENZIE, L.: 'Turnpike theorems for a generalized Leontief model'. *Econometrica*, 31 (1963) 165-180.
- (48) MCKENZIE, L.: 'Maximal paths in the Von Neumann Model'. In (45), 43-63.

- (49) NAGY, T.: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past and fu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61 (1971) 430-436.
- (50) NEUMANN, J. VON: 'A model of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3 (1945) 1-9.
- (51) NEUMANN, J. VON: 'Az általános gazdasági egyensúly egy modellje'. In (52), 160-176. Translation of (50).
- (52) NEUMANN, J. VON: *Válogatott előadások és tanulmányok* (Selected lectures and studi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65).
- (53) NURKSE, R.: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Blackwell (1955).
- (54) NURKSE, R.: *Equilibrium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55) NYERS, R.: *Gazdaságpolitikánk és 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reformja*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Budapest: Kossuth (1968).
- (56) NYERS, R.: *25 kérdés és válasz gazdaságpolitikai kérdésekről*. Budapest: Kossuth (1969). For translation see (57).
- (57) NYERS, R.: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 Twenty-five Questions and Twenty-five Answers*. Budapest: Pannonia Press (1969).
- (58) RADNER, R.: 'Paths of economic growth that are optimal with regard only to final states: A 'turnpike theor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8 (1961) 98-104.
- (59) RAMSEY, F.P.: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 Journal*, 38 (1928) 543-559.

- (60) RIMLER, J.: 'A gazdasági fejlődés vizsgálata és a faktoranalízis' (The exami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factor analysis). *Közgazdasági Szemle*, 17 (1970) 913-926.
- (61) RIMLER, J.: 'Kísérlet a faktoranalízis alkalmazására a gazdasági fejlődés vizsgálatában' (An attempt at applying factor analysi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Közgazdasági Szemle*, 17 (1970) 1195-1214.
- (62) ROMÁN, Z.: 'Iparunk ágazati szerkezetének sajátosságai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branch-pattern of Hungarian indust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5 (1968) 1141-1153.
- (63) ROSENSTEIN-RODAN, P.N.: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33 (1943).
- (64) STREETEN, P.: 'Unbalanced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11 (1959) 167-190.
- (65) TSUKUI, J.: 'Turnpike theorem in a generalized dynamic input-output system'. *Econometrica*, 34 (1966) 396-407.
- (66) YOUNG A.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38 (1928) 527-542.
- (67) *A magyar ipar ágazati szerkezete* (The branch-pattern of Hungarian industry). Budapest: Magyar Tudományos Akadémia Ipargazdaságtani Kutatócsoportja (1968).
- (68) *A munkaerő és életszínvonal távlati tervkonceptiója* (The long-term planning conception of manpower and living standards; mimeographed). Budapest: Munkaerő és Életszínvonal Távlati Tervezési Bizottság (1971).
- (69) *A Study of Industrial Growth*.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3).
- (70) *Az építőipar nemzetközi fejlődésének elemzés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imeographed). Budapest: Építésgazdasági és Szervezési Intézet (1968).

- (71) *Measuring the Nation's Wealth - Volume Twenty-Nine.*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72) *Népgazdasági mérlegek 1960-70* (Balanc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covering 1960-70).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1971).
- (73) RÓZSÁNYI, Z.: *Problèmes de la structure industrielle de l'industrie hongroise*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branch-pattern of Hungarian indust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5 (1968): 1141-1153.
- (74) RÖZSÉNYI, Z.: *Proble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 (1943).
- (75) STREETEN, T.: *Unbalanced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11 (1959): 167-180.
- (76) TAKÁCS, J.: *Turkije theorem in a generalized dynamic input-output system*. *Economica*, 34 (1966): 396-407.
- (77) YOUNG, A.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58 (1928): 527-542.
- (78) *A magyar ipar ágazati szerkeze (The branch-pattern of Hungarian industry)*. Budapest: Magyar Tudományos Akadémia Ipargazdasági Kutatócsoportja (1968).
- (79) *A munkás és életmódszeri követelmények (The long-term planning conception of manpower and living standards; mimeographed)*. Budapest: Munkás és Életmódszeri Kutatócsoport (1971).
- (80) *A Study of Industrial Growth*.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3).
- (81) *Aspects nouveaux de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imeographed)*. Budapest: Ipargazdasági Kutatócsoport (1968).

译 名 对 照 表

Adelman, I.	阿德尔曼	Houthakker, H, S.	霍撒克
Augustinovics, M.	欧古斯丁诺维奇	Huszar, I.	胡萨尔
Bauer, T.	鲍乌尔	Hoch, R.	霍奇
Bekker, ZS.	拜凯尔	Janossy, F.	亚诺希
Berend, I.	拜伦德	Kiss, A.	基什
Bliss, H.	布莉斯	Kovacs, J.	科瓦奇
Brody, A.	布罗迪	Koopmans, T, C.	库普曼斯
Cass, D.	卡斯	Kornai, J.	科尔内
Chenery, H, B.	钱纳里	List, F.	利斯特
Cravero, R.	茨拉韦罗	Madarasz, B.	马道拉斯
Barna, G.	鲍尔瑙	Malinvaud, E.	马林沃德
Cukor, G.	楚科尔	Martos, B.	毛托什
Darvas, G.	道尔瓦什	Bacharach, M, O, L.	巴卡拉克
de Vries, F.	德弗里斯	Mckenzie, L.	麦肯齐
Dorfman, R.	多夫曼	Matthews, R, C, O.	马修斯
Drecin, J.	德雷琴	Monigl, I.	迈尼格尔
Ehrlich, E.	埃赫尔利奇	Morris, C, T.	莫里斯
Friss,	弗里什	Nagy, T.	纳吉
Gossen,	戈森	Nagy, J.	纳吉
Hahn, F, H.	哈恩	Neumann, J, Von.	诺伊曼
Hajdu	哈伊杜	Nurkse, R.	纳克斯
Hetenyi, I.	海坦尼	Nyers, R.	温尔什
Hirschman, A, O.	赫希曼	Radner, R.	拉德纳
Hirschman, E, G	赫希曼	Ramsey, F, P.	拉姆齐
Hoffmann, W, G.	霍夫曼	Rimler, J.	里姆莱尔
Horvat, B.	霍尔瓦特	Roman, Z.	罗曼

JÁNOS KORNAI
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AMSTERDAM-LONDON

突进与和谐的增长

——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

亚诺什·科尔内 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5印张 76000字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册

统一书号：4312·242 定价：1.50元

ISBN 7-5058-0061-2/F·54

责任编辑：王 林

责任校对：段小青

封面设计：卜建晨

版式设计：代小卫

为攀登高峰而奋斗

——记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

系、系、系、系、系

地质出版社 发行 地质出版社 发行

地质出版社 发行

地质出版社 发行

地质出版社 发行

地质出版社 发行

地质出版社 发行



统一书号：4312·242 定价：1.50元

ISBN 7-5058-0061-2 / F·54